

「曉江亭」作為臺灣傳統環境的邊境與 節點之空間構成

吳瑞真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生

摘要

興建於日治時期大正15年（1926）的曉江亭座落於竹東東寧橋橋畔，與東寧橋、福德祠共同成爲一個整體的空間脈絡。這樣的空間構成，從日治時期延續迄今，演繹了地方發展的歷史，也在不同階段積累著地方生活中重要節點的不同角色，同時構成了多元的內在文化特質。

本文企圖思考超越現代主義理論所構築的市鎮規劃與設計所產生的都市與聚落，如何理解非在現代主義理念支配下建構的傳統環境。從地理位置而言，「曉江亭」位於凱文·林區（Kevin Lynch, 1918–1984）所界定的「通道」（paths）的沿線，又是位於區分兩個街區（districts），或是穿越作爲「邊緣」（edges）的橋上，具備了環境空間構成的節點（nodes）概念特質。

在其複合的空間組成中，以東寧橋爲核心。曉江亭、福德祠的建造是因東寧橋於大正15年（1926）的興建而同時竣工。曉江亭具備有紀念性的「碑亭」與休憩功能的「茶亭」等雙重功能，又，福德祠與分佈於中國南方至越南等地的「廊橋」、「風雨橋」、「橋屋」之功能相近。東寧橋做爲竹東通往內山的重要聯繫道路，是地方仕紳與知識份子們，延續清代以來地方菁英造橋鋪路的公益精神，同時聘請民間工匠，應用了學習從中國福建傳來的最新石拱結構技術，自主完成建造了取代原來的木造

收稿日期：109年4月6日；通過日期：109年5月5日。

的軟陂橋，成為石拱橋的東寧橋。最後，「曉江亭」，在晚近時，居民砌築了「洗衫窟」，作為日常洗衣的場所，成為豐富生活感的場域。

東寧橋的石砌拱橋具有拱型傳自古老時代之古典美學，與技術傳統的根源，結合茶亭與守護石橋的福德祠之外，又結合居民日常生活的洗衫與對河川水神的信仰，這裡的「曉江亭」，是臺灣傳統社會對於市鎮空間的邊緣、通道與節點的認知與其形塑的歷史發展過程，進而分析這個作為環境節點性格之「曉江亭」，與其實質空間構成元素的文化特質的一個重要案例。

關鍵字：曉江亭、東寧橋、福德祠、邊境、節點、通道

一、前言

1960年代以後，世界建築設計與都市計畫的發展，開始對過去過度信賴的現代主義規劃下產生的建築與都市有了懷疑。在這樣的趨勢下，恢復了原先被現代主義排除掉的地域固有特質。過去，現代主義的都市計畫理論主張將現實還原為白紙狀態，以描繪出新的都市圖像。在跨越現代主義都市計畫理論之後，是從解讀都市，或是就都市體驗者的邏輯納入新的都市計畫理論開始，那不是以都市的合理性機能為問題，而是將現實的都市多樣性視為問題。都市，是由各種各樣的事物及活動行為所組成，本身就存在多樣性，透過讀取現實都市的多樣性，並以同樣「解讀」的觀點再納入新設施的規劃與設計，得以創造出更多的具有多樣性環境。¹

1960年代，凱文·林區從解讀都市地域歷史、都市環境紋理的角度，著書《都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 1960）。為讀取都市的多樣意象，林區提出了以「通道」（paths）、「邊緣」（edges）、「節點」（nodes）、「街區」（districts）、「地標」（landmarks）等具有普遍性的環境意象元素五種類型，作為有效理解都市的觀點與手段。² 林區認為所居住的都市或環境之可辨讀性（legibility）是極為重要的，一個人一旦不幸迷了路，所產生的焦慮感，甚至伴隨而來的恐懼，便證明了迷失方向跟一個人的健康與安定感有多麼有關。其實，環境要被人們辨讀，對於人們本人所處的那個環境裡，要能辨向定位則是其前提條件。

林區進一步說，我們的世界可以圍繞著一組焦點而組織起來，或是分為幾個已有命名的區域，或是由記憶中的路線所連接起來。辨向的方法各式各樣，而人們可用來辨別自己所處世界的線索更是無窮無盡，這些全都對於我們現在如何在都市中

1. 笠原一人、田中禎彥，〈對近代的懷疑：地域、環境、傳統〉，收錄於中川理、石田潤一郎編著，《近代建築史》（南天書局，2019.10），頁273-274

2. 笠原一人、田中禎彥，〈對近代的懷疑：地域、環境、傳統〉，頁291-293。

定位，提供了有趣的啟發。令人驚訝的是，大多數這些例子似乎反覆出現某幾類意象的元素類型，讓我們得以便利地將之區分為通道、地標、邊界、節點、區位的五類。³

本文在偶然的機會下認識了「曉江亭」⁴ 這個複合性環境空間構成，極為類似林區所稱的「節點」。雖然我們知道林區所提的環境意象五種類型，在真實的世界裡並非單獨存在。區域由組織節點構成，由邊緣劃分，其間有通道穿越，其中散佈著地標，各種元素彼此交疊穿插。就算將資料分門別類論述，最終，還是得統整成一完整的意象。但是在此將進行對「曉江亭」進行歷史文獻的分析，作為引用林區「都市意象」理論架構進一步分析竹東地區（舊名樹杞林街）與「曉江亭」邊緣與節點之前提。換言之，本文企圖在臺灣傳統歷史環境中，進行對「曉江亭」作空間構成之歷史性分析。

就本文關心的對象「曉江亭」⁵ 所在的位置，是位於自清代以來成為地區核心竹東鎮（樹杞林街）的邊緣，也是位於日治時期樹杞林街與上、下公館庄的交界，亦即頭前溪支流軟陂溪的左岸位置，這是清代、日治、至戰後迄今，從地區政治、經濟中心的樹杞林街來往上、下公館庄與上坪庄的井上道路沿線上。換言之，「曉江亭」座落於臺灣傳統社會於市鎮空間的邊緣、通道與節點之上。以下，嘗試就其作為環境節點性格特質形塑的歷程，與實質空間構成的內在文化特質，進行討論。

3. 胡家璇譯，《城市意象》（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14.9.3），頁19。（原文為英文：Kevin Lynch, *The Image of the Ci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0.）。

4. 本文為行文方便，若文中出現「曉江亭」，除了前後文有特別的意涵外，若當一般名詞，則指包括亭建築、福德祠與東寧橋的複合設施；若是不加「」曉江亭一般名詞，乃狹義的指那棟「亭」建築本身。

5. 同上註。

二、竹東街區「邊緣」與「節點」性格之「曉江亭」

以竹東地區為街區範圍（districts）觀察其歷史發展脈絡，「曉江亭」可視為臺灣傳統環境空間構成脈絡中的「邊緣」與「節點」。在此，從地方產業發展及道路交通網絡層面切入，以掌握「曉江亭」在竹東地區環境上的意義。

（一）樹杞林街的地域樞紐性質與竹東地區產業發展

清嘉慶11年（1806），「金惠成墾號」入墾舊名樹杞林的竹東一地，設置隘寮。⁶ 咸豐年間（1851-1861），樹杞林的樟腦林砍伐前線逐漸推進更內山的員嶼子、花草林、軟橋等處。當時內山盛產樟腦，上公館、員嶼仔一地逐漸發展。⁷ 1860年臺灣開港以後，對茶、糖、樟腦的需求量大增，樹杞林作為樟腦重要集散地之一，設置了「腦市」。⁸

日治時期，明治30年（1897）設置樹杞林辨務署，於五指山設立撫墾署，置隘線與隘寮。大正9年（1920）設置竹東郡，之後更確立了竹東成為新竹州蕃地的治

6. 鄭森松，《竹東鎮志 歷史篇》（新竹縣竹東鎮：竹東鎮公所），頁20；林子煒，《竹東鎮志 地理篇》（新竹縣竹東鎮：竹東鎮公所），頁169；王嵩山，《竹東鎮志 政事篇》（新竹縣竹東鎮：竹東鎮公所），頁8。「樹杞林」之意，原為未開發以前，樹杞樹繁茂成林，樹杞樹以客家讀音為「象棋」，樹杞林又名為象棋林（客語音「ㄗㄩ」）。日治時期以其地位於新竹城之東，於大正9年（1920年），廢廳改州時，從樹杞堡改稱為竹東郡。參看鄭森松，《竹東鎮志 歷史篇》，頁4、12與19。

7. 櫻井勉任編著，《新竹縣志初稿》，明治30年（西元1897年），新竹支廳，臺灣大通書局複印，頁22。

8.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臺北：聯經，1997），頁83。

理中心(圖1)。⁹

除了樟腦之外，大正4年(1915)，時任臺灣總督府臺灣糖務局庶務課囑託的松岡富雄，看見臺灣糖業的發展潛能，因而創辦了「松岡拓殖會社」，於大正6年(1917)購置銅鑼、三湖、樹杞林等3個傳統糖廍合併為「苗栗製糖組合」，並改良為「新式製糖所」，壓榨量可達500噸；隔年，又與地方人士議妥，改組為「新竹製糖株式會社」，¹⁰再於大正9年(1920)5月25日成立了「樹杞林製糖所」。¹¹

大正年間正是竹東地區產業發展快速的時期。新竹鄭用錫家族在大正元年(1912)設立新竹電燈株式會社，8年(1919)5月，利用頭前溪上游上坪溪攔河堰的7.7公尺渠水道落差進行發電，建成「軟橋水力發電廠」；14年(1925)採用法蘭西式橫軸水輪發電機兩部，發電量200 KW，提供竹東地區使用。¹²



圖1 1897日治臺灣假製二十萬分一圖。方框處為後世曉江亭、福德祠與東寧橋所在位置示意，圖片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歷史百年地圖》，網址：<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aspx> (2020.3.20瀏覽)。

9.鄧毅中，《由產業設施發展歷程論城鄉文化資產的保存——以竹東鎮為例》(桃園縣中壢市：中原大學建築系碩士學位論文，2003)，頁2-22。

10.臺灣日日新報社，〈樹杞林製糖の認可〉，《臺灣日日新報》(1917.10.11)。

11.臺灣日日新報社，〈樹杞林製糖所〉，《臺灣日日新報》(1920.5.25)。

12.鄧毅中，《由產業設施發展歷程論城鄉文化資產的保存——以竹東鎮為例》，頁2-20。

因應產業發展與農業稻米耕種的需求，大正12年(1922)竹東水利組合成立，管理範圍包含現今的竹東、芎林、橫山一帶，灌溉面積達1,328甲。同年，二重埔地方仕紳林春秀籌組「三益株式會社」¹³為興築竹東圳做準備，大正15年(1926)8月10日「三益株式會社」正式成立，竹東圳開始興工。昭和3年(1928)竹東圳完工通水，覆蓋範圍灌溉頭重埔、二重埔及三重埔一帶。¹⁴至昭和11年(1936)，灌溉面積已達2,590甲，¹⁵由於水源充足，讓竹東一帶可以進行一年二期的稻田耕作，提高了稻米產量。¹⁶

另一方面，隨著竹東圳開鑿之後帶來蓬勃發展的農業之外，1920年代竹東地區的產業政策也逐步由農轉工，竹東地區擁有石灰石、石礮等自然資源，於「原料區位」佔有絕對的優勢，提供新式工業設施所需的能源。¹⁷昭和2年(1927)，日本地質學家發現竹東郡員峴子地區的背斜油礦，翌年(1928)，隨著竹東大圳工程推進，在開鑿隧道時，發現了具可燃質的天然氣外洩，雖無表面油兆，但因地質與錦水油田相似，地質學家因此認為此處應含有油及瓦斯。昭和9年(1934)，取得礦權的「臺灣鑛業株式會社」，於2月開始開鑿油井，10月，於竹東街下公館創設石油精製工廠，11月，於湖口北窩進行油井試掘鑽探；昭和10年(1935)，於橫山下田寮坑再開鑿油井兩處¹⁸，竹東地區整體油礦事業越趨發達。

13.臺灣文官武官民間職員錄發行所，《臺灣官民職員錄》(臺灣文官武官民間職員錄發行所，1928.8.18)，頁163。

14.曾光宗主持計畫，《新竹縣竹東圳文化地景整體規劃暨調查研究成果報告書》(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08)，頁29。

15.林于煒，《竹東鎮志 地理篇》(竹東鎮公所，2005)，頁76。

16.客家委員會，《竹東圳路古今談——自然水路人文行旅》(客家委員會，2014)，頁35。

17.鄧毅中，《由產業設施發展歷程論城鄉文化資產的保存——以竹東鎮為例》，頁2-22。

18.鄧毅中，《由產業設施發展歷程論城鄉文化資產的保存——以竹東鎮為例》，頁3-8。

竹東在大正年間呈現產業方面可預見的潛力，至昭和年間的蓬勃發展，相應交通網路系統也隨之建設。竹東街庄從清代的樹杞林到日治時期昭和年間的竹東街，始終是竹東一地行政與商業的樞紐位置；而位於竹東通往員嶼子、上坪、五峰方向必經橋梁「軟陂橋」旁的曉江亭一帶，地理位置則既是相對於核心-竹東街庄的邊陲，又是竹東街通往內山地區的重要交通網絡節點。

（二）樹杞林交通網絡與東寧橋改建

大正15年〈東寧橋落成徵詩〉¹⁹ 文句中提到「竹東郡竹東庄（舊地名杞林）之東南康莊大道。數十里之村莊。往來竹東到新竹者。胥經是路。」，這裡「東南康莊大道」，「往來竹東到新竹者。胥經是路」所指的竹東聯繫新竹的必經道路，在清代已經成形。

竹東庄，於清代稱之為樹杞林堡，至日治初期改制為樹杞林街，道路建設以往西北聯繫竹塹城、往南聯繫北埔、往東聯繫九芎林的「隘路」為基礎而興建，其中，從竹塹城聯結樹杞林的二條「隘路」，發展成為清代的「官路」。²⁰ 日治初期，這條新竹與竹東聯繫的「康莊大道」，於明治37年（1904）完成部分整修與約

19.臺灣日日新報社，〈東寧橋落成徵詩〉，收錄於《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11月6日第4版「翰墨因緣」專欄。「竹東郡竹東庄（舊地名杞林）之東南康莊大道。數十里之村莊。往來竹東到新竹者。胥經是路。距街里許中阻一溪。度以木橋。然易朽損。數歲一易。鄉人甘承宗、邱騎鵬二氏。有鑑及此。因倡勸各地慈善家。集金約萬圓。鳩工度材。改築石橋。凡柱樑欄檻。悉以碎石砌成。頗決壯觀。橋之側。築一石亭。以為休憩之所。此不獨便利行人。凡遠近人士。春秋佳日。夏時納涼賞月。倍添景趣。爰酌定左記方法。徵求詩篇。願海內騷人。多惠珠玉。為斯橋生色。並擬將中選十名內之佳作勒石。置諸亭間永垂紀念。一題目。東寧橋落成。二詩體。七絕限先韻。三期限。大正14年（1925）11月30日止。四交卷。竹東郡竹東庄李達泉收。五詞宗。未定。六贈品。二十名內均有薄酬。由羅享增、甘承宗寄附。」

20.林子燁，《竹東鎮志 地理篇》（新竹縣：竹東鎮公所，2011），頁208-209。

200多公尺的橋梁改建工程²¹；大正9年（1920），新竹州成立，這條聯絡道路改為「指定道路」，後於大正14年（1934），由新竹州及自動車商會補助，進行重新修建。

除了修築西北方向，通往新竹的道路之外，另一條從樹杞林往西南，通往上坪、井上的道路，是大正7年（1918）5月起，以原有「隘路」重新鋪設，成為連結竹東、上坪等地，到井上²²的「井上道路」，為以由國庫或地方經費出資改善養護的「指定道路」，是新竹地區重要的東西向運輸走廊。²³

據《樹杞林志》所載，光緒5年（1879）建造在軟陂仔莊的軟陂橋，寬僅約1.22公尺，長約為7.04公尺，是座規模不大的橋梁。從清末開始，它串連起商業與政治中心的樹杞林街與內山的山林資源產區，是重要的連結橋梁。這裡也可以想像，軟陂橋在大正7年（1918）鋪設井上道路的基礎，是在清代寬度僅1.22公尺的軟陂木造橋作為基礎上所增修的道路。大正15年（1926）軟陂橋易木為石之後稱為東寧橋，就現狀估計當時的橋面寬為3.5公尺，²⁴橋上鋪面道路，即今新竹縣122號道路，亦為通往員嶼子、上坪的南清公路。

昭和8年（1933）起，從臺北三峽開始，聯通山區的道路開始鋪設，經新竹州內大溪、龍潭、關西至竹東，再往北埔、三灣、獅潭、大湖、卓蘭等地，一直往南連接至臺中州東勢地區，路線總長126公里。其中，昭和9年（1934），修築竹東至員嶼子間寬11公尺道路，同時亦修築員嶼子至上坪間寬4.5公尺道路；直至昭和

21.鄭森松，《竹東鎮志 歷史篇》（新竹縣：竹東鎮公所，2005），頁212。

22.現新竹縣五峰鄉桃山村清泉。

23.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灣課，《臺灣の道路》（臺北市：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灣課，1937.9.20），頁29-30。

陳柏志，《「曉江亭」文化資產價值評估調查研究報告》（新竹縣政府文化局補助，2017）。

24.目前橋面已經拓寬，無法從現狀直接測量，此以橋拱深度做為日治時期橋面寬度。



圖2 以樹杞林街（竹東）為樞紐之地區道路系統網圖（原圖收錄於《臺灣の道路》「臺灣指定道路圖」，昭和16年9月印製。）圖片來源：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灣課，《臺灣の道路》，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灣課，1941。

11年（1936）路面拓展²⁵；12、13年間（1937-38），新竹地區至竹東及員峯子間道路，全面鋪設為柏油路面。²⁶如此，聯繫起臺灣南、北近山地區主要鄉鎮，對於山地開發及山林物產運輸，相當有助益，亦更為強化了竹東郡作為近山地區主要交通轉運及物產集散中心的角色。（圖2）

除了公路之外，1900年代初期，臺灣各地興起鋪設輕便鐵路風潮。總督府從明治39年（1906）起著手制定「私設軌道交通工具的管理法規」，40年（1907）2月完成「臺灣軌道令」草案，除了便利山區物資如煤礦、木材等的向外輸送，無形中也增進了人的流動，更為執政當局控管山林提供了更為便利的載具。

日治時期新竹州以今新竹市為中心的鐵道鋪設，始於明治40年11月（1907年）開設的「新竹拓殖軌道株式會社」，主要經營路線為新竹至樹杞林段，軌道設至竹東、北埔、內灣、舊港、浸水（香山）等地，陸次於明治44年（1911）至大正元年（1912）間，完成樹杞林至北埔段；大正2年（1913）完成樹杞林至北埔段以及關東橋至芎林段²⁷，並於大正6年（1917）增設此段路線的複線。

25.鄭森松，《竹東鎮志 歷史篇》，頁45。

26.鄭森松，《竹東鎮志 歷史篇》，頁212-213。

27.鄭森松，《竹東鎮志 歷史篇》，頁41。

通過「軟坡橋」往東南山區的輕便鐵道，是在大正12年（1923），由地方仕紳彭錦球、彭清政組成「竹東軌道組合」後，在大正13年（1924）鋪設從樹杞林至上公館，延伸至上坪的鐵道，²⁸並在昭和3年（1928）延長輕便鐵道至十八兒（今五峰鄉），以利木材及各項物資的運輸。²⁹由於竹東為鄰近各鄉鎮的中心地帶，因此輕便車即以竹東為轉運站。³⁰（圖3、4、5）此外，尚有「新竹製糖會社」也設有一條自糖廠至二重埔的自用輕便車道，專門用來運載甘蔗。³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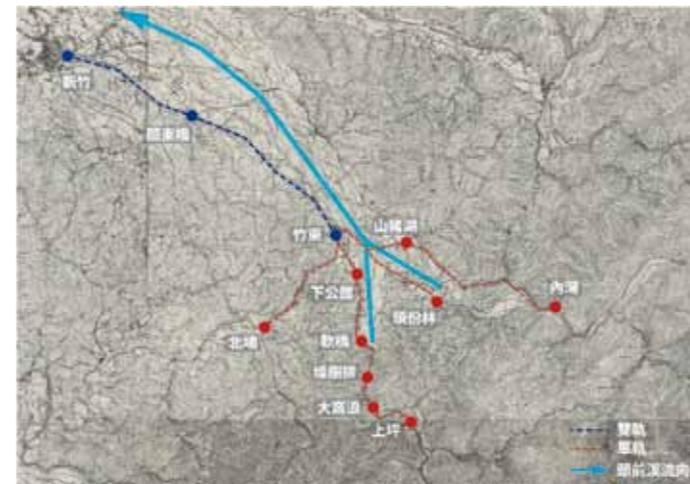


圖3 大正年間新竹、竹東一帶手押臺車路線圖，圖片來源：林宇謙根據大正10年（1921）兩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與大正13年（1924）五萬分之一地形圖整理繪製。底圖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歷史百年地圖》，網址：<http://gisrv4.sinica.edu.tw/gis/twhgis.aspx>（2020.3.20瀏覽）。

28.劉奕成，《日殖時期新竹火車站地區發展歷程之研究（1895-1945）》（臺北：淡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6），頁47；《竹東鎮志 歷史篇》，頁46；《竹東鎮志 地理篇》，頁219、220。

29.劉奕成，《日殖時期新竹火車站地區發展歷程之研究（1895-1945）》，頁47；《竹東鎮志 歷史篇》，頁46；《竹東鎮志 地理篇》，頁219、220。

30.潘國正，《老照片說故事3——竹塹思想起》（新竹市：竹塹文化資產叢書出版社，2013），頁88。

31.每年使用時間為11月至隔年5月，車輛與鐵道皆糖廠自備，路權可能是向新竹拓殖軌道或臺灣軌道申請，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耆老口述歷史叢書（十五）——新竹市鄉土史料》，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頁158。



圖4 竹東輕便車，圖片來源：黃榮洛拍攝，劉瑞祺文字整理，陳騰芳等編著，《竹塹思想起 老照片說故事》，第一輯，2002，頁88。



圖5 位在東寧路182號的輕便車站，圖片來源：黎許傳編著，《照說橡棋林：竹東老照片集》，新竹縣立文化中心，2000，頁142。

據上總觀輕便鐵道與公路的發展，可以理解，在大正15年（1926）改建木造軟陂橋為石造東寧橋之前，大正7年（1918）5月起正式修築從樹杞林至上坪等地的井上道路已經完成，13年由「竹東軌道組合」鋪設從樹杞林至上公館，延伸至上坪的輕便鐵道也已經鋪設完成。

臺灣輕便鐵道軌道寬度，有495mm、508mm、545mm到610mm都有，森林鐵道與糖廠鐵道常用的軌寬度更達到762mm。³² 據此，推測因應大正13年樹杞林至上坪間鋪設鐵軌，創建於清末光緒5年（1879）接連「隘路」，寬約1.22公尺的木造軟陂橋應該有所擴充，如此也可以想像在修築井上道路與鋪設輕便鐵道時，改建木橋成石造的東寧橋的急迫性，而有了後來地方領導者甘承宗、邱騎鵬、宋燕貽與彭錦念等人共同呼籲，發起捐款，集眾之力，建造石橋。

從以新竹與竹東為中心的道路與輕便鐵道網路的形成過程，可以理解地方仕紳

32.蘇昭旭，《放眼國際：花東鐵道情懷》（花蓮縣文化局，2010），頁30。

何以迫切改建木造軟陂橋為石造東寧橋。竹東地區從清代伐木製作樟腦，天然資源天然氣、石灰石、石礫的開採，到製糖業的發展，不同時代的衍進而發展種種多樣的產業，自然需要依賴井上道路與從竹東至上坪的輕便鐵道，以達人流與物流的需要。自然，對於當時採用新穎持久的石拱構築結構技術建造石拱橋，以取代木造，寬度狹窄的軟陂橋，亦是必然趨勢。

三、「曉江亭」（亭、土地公、東寧橋）的建造沿革

曉江亭（圖6），位於新竹縣竹東鎮中山里東寧路二段55號。據地方耆老李增昌先生所言，曉江亭因背山面東，一早就能照到太陽，又座落於軟陂溪水邊，因而得名。³³ 李氏進一步說明，曉江亭於大正15年（1926）落成的時候，屋頂原是兩坡水屋頂形式，周圍做出牌樓面（女兒牆）環繞，但約在30多年，因為屋頂損壞漏水，拆掉了木構架與鋪設的屋瓦，改成現在的水泥平頂屋頂樣式。³⁴



圖6 曉江亭現況，圖片來源：吳瑞真提供（2017.3.18拍攝）。

本文所稱的「曉江亭」，就廣義而言，其涵蓋的環境空間元素包含了一般認為熱心公益人士放置燒煮茶水以供往來行人休憩的曉江亭建築，曉江亭旁側的石製小型土地神祠，以及橫跨頭前溪支流軟陂溪，聯絡樹杞林街³⁵與上、下公館庄的南清

33.訪談李增昌先生所得，訪談日期：2019.2.27，訪談地點：竹東李宅。

34.訪談李增昌先生所得，訪談日期：2019.2.27，訪談地點：竹東李宅。

35.今竹東市。

道路³⁶的東寧橋³⁷，及位於東寧橋下的洗衫窟等建築與設施。這四種實體設施所構成的複合性設施，合稱為「曉江亭」，但是若狹義而言，曉江亭就是指「亭」本身的建築體。（圖7~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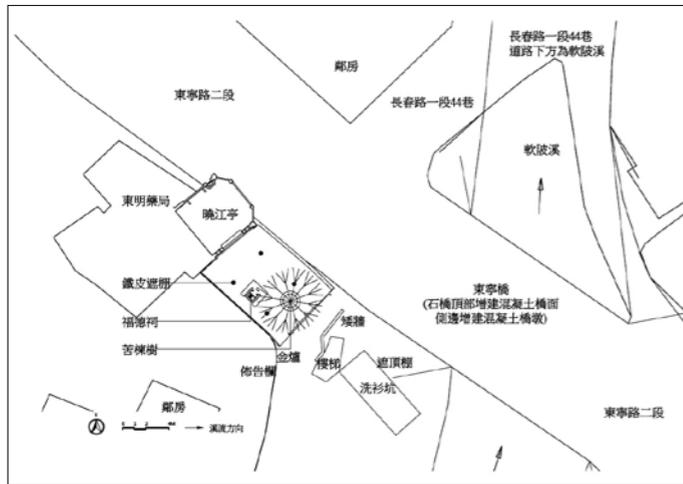


圖7 曉江亭、福德祠、東寧橋、洗衫坑相關位置圖，圖片來源：陳華興繪製，《縣定古蹟竹東曉江亭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新竹縣文化局委託，承熙建築師事務所執行，2020.5，頁3-4。



圖8 日治時期曉江亭、福德祠、東寧橋使用想像圖，圖片來源：蘇志民繪製，《縣定古蹟竹東曉江亭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新竹縣文化局委託，承熙建築師事務所執行，2020.5，頁3-2。



圖9 1960年代東寧橋與曉江亭一帶，圖片來源：李增昌拍攝，刊於「竹東洗衫坑」，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HakkaRiverCulture/>（2020.3.20瀏覽）。



圖10 俯瞰曉江亭、福德祠、東寧橋一帶，圖片來源：《縣定古蹟竹東曉江亭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新竹縣文化局委託，承熙建築師事務所執行，2020.5，頁2-29。

關於「曉江亭」的興建年代與興築原因，《臺灣日日新報》刊登了如下三則東寧橋「落成式」、「初渡式」與「徵詩」活動相關訊息，間接披露了一些關於「曉江亭」興建年代的訊息。這三則記載中。有兩則是東寧橋實際上落成的消息，分別是於大正15年（1926）5月3日第四版，標題為〈東寧橋竣工〉³⁸，與於大正15年（1926）5月10日第四版，標題為〈東寧橋初渡式〉³⁹，這兩則資訊，確定了東

38. 〈東寧橋竣工〉，《漢文日日新報》（1926.5.3），版4。「竹東郡竹東庄軟波溪東寧橋架造。原擬去歲季冬落成。因工事滯延延期。今已告竣。訂五月八日，即古曆三月二十七日。舉落成式。該橋全部石造。極其壯麗。橋畔築一亭，亦甚幽雅。亭之後壁。橫豎一廣石版。幅四尺（約1.2公尺）長一丈（約3.03公尺）有奇。首刊碑記及募款者姓名。外曩徵東寧橋落成詩。左右詞宗選取各十五名內之佳作。刻勒其間。亭畔建福德祠一座。亦悉用琢石造成。互相輝映。頗壯觀瞻。值茲落成之日。有演戲煙火爆揚諸餘興。屆時當有一番盛況云。」因為此處為日治時期，因此度量橫的計算以日本尺寸計算。1尺≐0.303公尺；1丈≐3.03公尺。

39. 臺灣日日新報社，〈東寧橋初渡式〉，收錄於《漢文日日新報》（1926.5.10），版4。「新竹州竹東庄東寧橋。去八日午前十一時半。舉落成初渡式。首由甘承宗氏述式辭。並報告工事。次有內田郡守祝辭。然後初渡式後。假郡守官舍。盛開祝宴。午後二時頃。盡歡而散。是日重要來賓。為政所地方課長。及郡守（乃由竹東庄甘承）宗。宋燕貽。彭錦念三氏出為發起募捐。地方民寄附金。計一萬千二百一拾一圓云。」

36. 今新竹縣122號道路。

37. 1926年改建前，名為軟波橋。

寧橋的落成是在1926年5月8日。至於另一則報導是在前一年的1925年11月6日第四版的「翰墨因緣」專欄，題為〈東寧橋落成徵詩〉的文稿。⁴⁰

關於〈東寧橋落成徵詩〉與前兩則竣工儀式的報導時間差，在〈東寧橋竣工〉文中亦有所述：「原擬去歲（1925）季冬落成。因工事遲滯延期。今已告竣。訂五月八日，即古曆三月二十七日。舉落成式」。不過，第三則消息也表露了當時竣工的東寧橋並非新蓋的橋，其前身為名「軟陂橋」的木橋。清代文獻《樹杞林志》中有載「軟陂橋，在樹杞林軟陂仔。光緒五年（1879）造。寬三尺八寸（約1.22公尺）、長二丈二尺（約7.04公尺）。」⁴¹清代的軟陂仔莊，屬當時樹杞林堡轄內4街173三莊的其中之一，北為樹杞林街，南通上公館莊，連結至員嶼仔莊、花草林莊、軟橋莊、燥樹排莊、田寮坑莊、上坪莊以至五指山⁴²（圖1），而軟陂橋則是竹東往上下公館、上坪內山去的重要道路南清道路上的聯繫橋梁。

據上所述，東寧橋前身的木造軟陂橋在光緒5年（1879）即已出現，並在大正15年（1926）改建成石橋，成為東寧橋。那麼，作為環境節點一部分的曉江亭與福德祠，又是在何時被興建出來的呢？

〈東寧橋竣工〉一文中，有載：

橫豎一廣石版。幅四尺（約1.2公尺）長一丈（約3.03公尺）有奇。首刊碑記及募款者姓名。外曩徵東寧橋落成詩。左右詞宗選取各十五名內之佳作。刻勒其間。

這塊石板，目前仍嵌置在曉江亭內後方。石板本身寬約3.5公尺、高1.5公尺，碑文鐫刻於石板內寬3公尺及高1.2公尺範圍中，也就是說，文獻記載與實存的石碑

40.同註釋6。

41.（清）林百川、林學源，《樹杞林志》，建置志／水利，頁28。因為此處所記載的尺寸為清朝的文獻，因此以清朝的度量衡，1尺=0.32公尺；1丈=3.2公尺計算。

42.（清）林百川、林學源，《樹杞林志》「建置志」，臺灣文獻叢刊第63種，頁23。

兩者是相符的。只可惜由於石碑毀損嚴重，大部分字體已無法辨識，僅能分辨出部份當時捐金興建東寧橋的家族包含甘氏、彭氏、傅氏、黃氏、林氏、羅氏、余氏、徐氏、劉氏、詹氏等竹東一帶大家族的姓氏。⁴³根據文獻與現場的遺跡，可以推測建亭的另一重要功能，是為了勒刻建亭緣起、捐助者功德與徵詩佳作。（圖11）

在〈東寧橋落成徵詩〉中亦有：

橋之側。築一石亭。以為休憩之所。此不獨便利行人。凡遠近人士。春秋佳日。夏時納涼賞月。倍添景趣。爰酌定左記方法。徵求詩篇。顧海內騷人。多惠珠玉。為斯橋生色。竝擬將中選十名內之佳作勒石。置諸亭間永垂紀念。

曉江亭做為便利行人休憩的場所，與東寧橋同為遠近聞名的知名景點，可以作為每年春節郊遊、中秋賞月，或是夏天納涼之所，更增添此地風景的趣致。而曉江亭所具「休憩之所」的功能，則扮演了臺灣普遍存在的「茶亭」的角色。就碑亭與茶亭的雙重角色，及文中所描述文意與文章前後文的脈絡，反映了曉江亭與東寧橋彼此非常密切的關連。

又，關於福德祠，〈東寧橋竣工〉文中有「亭畔建福德祠一座。亦悉用琢石造成。互相輝映。頗壯觀瞻。值茲落成之日。有演戲煙火爆揚諸餘興。屆時當有一番盛況云」。曉江亭旁建造福德祠，在東寧橋落成之日，進行演戲、發放煙火、施放



圖11 曉江亭內鑲嵌於壁體的碑記，圖片來源：吳瑞真提供（2019.7.20拍攝）。

43.本文投稿前，文化部文資局與新竹縣政府文化資產科正就石板進行數位掃描，待掃描成果公布以後，應有更清晰的內文可以辨識。

爆竹以慶祝東寧橋的落成。於此，至大正15年（1926），東寧橋與曉江亭的設計施工建造成為遠近聞名的場所，福德祠土地公作為守護東寧橋的土地神靈，進行宗教祝賀竣工的信仰儀式。

因此，文獻雖未分別記載曉江亭與福德祠的興建年代，⁴⁴但根據上述三則報導，可以理解它們與東寧橋的落成儀式有密切的關連。儘管在此無法完全確定它們是否在軟陂橋時期就已存在，但能確知的是，今日所見的福德祠、曉江亭均是在大正15年（1926）改建東寧橋時，一起建造出來的建築。

四、「曉江亭」（橋、亭、祠）之建築樣式

（一）石拱結構的東寧橋

1. 現存臺灣的拱橋實例

大正15年（1926），軟陂橋木橋被改建為石造拱東寧橋，應用石砌拱技術，搭建了圓拱跨距5公尺的橋（圖12~14）。

石拱結構的起源非常古老，從紀元前兩河流域拜火教聖壇的構築傳統、羅馬帝國的拱、圓頂與拱卷構造，另一起源是古代中國漢墓之地下墓室圓拱構造傳統等。中國至隋朝大業6年（610年）河北趙縣安濟橋，由隋代傑出工匠的李春所設計之石造橋梁（圖15）。這座橋梁說明了中國擁有自己成熟的石造、磚造拱橋技術。

臺灣拱橋技術的傳來，可分為日治時期殖民政府所引進的西方近代建築技術所興建的橋梁，另一是自有清以來傳自海峽對岸中國東南沿海一帶的拱橋、城門拱洞

44. 本文曾經搜尋泓資訊公司與大鐸資訊公司於2005年製作之《臺灣日日新報 大鐸版》，以及2000年，由金臺灣資訊事實公司規劃設計的《臺灣文獻叢刊 合訂本（全文）（圖像）光碟檢索資料庫（線上資料庫）》，以「曉江亭」與「茶亭」為檢索詞進行搜尋，知道在清代與日治時期，並沒有發現有關軟陂莊內茶亭的任何資訊。

之營造技術與知識。目前臺灣已經不留清代所建造的拱橋，舊照片也不見清代拱橋結構之案例。在民國82年（1993）底，因為興建臺北捷運南港線時，進行府城北門一帶的考古挖掘，考古挖掘了在光緒10年（1884）興建完成的臺北府城牆，其水洞遺跡也如李乾朗所做的復原圖，並沒有發現曾經採用石拱的技術痕跡（圖16、17），清末的水洞工程或是日治時期馬蹄型水管結構，都與東寧橋石拱砌造技術無關。



圖12 1963年葛樂禮颱風來襲，東寧橋下洪水。照片中可見東寧橋為拱橋，圖片來源：李增昌拍攝，刊於「竹東洗衫坑」，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HakkaRiverCulture/>，（2020.3.20瀏覽）。



圖13 東寧橋由上游往下游方向所見的石拱橋墩，圖片來源：吳瑞真提供（2017.3.18拍攝）。



圖14 東寧橋石砌情形，圖片來源：吳瑞真提供（2017.3.18拍攝）。



圖15 河北趙縣安濟橋，圖片來源：茅以升主編，《中國古橋技術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5，圖版3 / 黑白 /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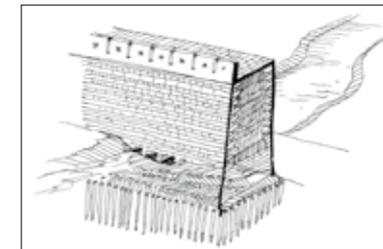


圖16 原臺北府城城牆下水洞（水關）採直樑架設結構示意圖，圖片來源：李乾朗，《臺北府城牆及礮臺基座遺址研究》，臺北市：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委託，1995.3，頁73。



圖17 明治39年（1906）埋設於原清代臺北府城地下之馬蹄型排水管，圖片來源：李乾朗，《臺北府城牆及礮臺基座遺址研究》，頁31。



圖18 苗栗縣魚藤坪龍騰斷橋，圖片來源：于炳盛、曹永德、王玉瑞著，《臺灣的橋樑》，臺灣地理百科86，臺北縣新店市：遠足文化，2007，頁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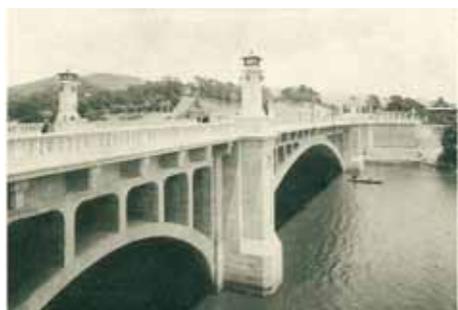


圖19 第二代明治橋（1930），圖片來源：謝森展，《臺灣回想：1895-1945 Taiwan recollected》，臺北市：創造力，1994，頁131。



圖20 北港溪糯米橋，圖片來源：于炳盛、曹永德、王玉瑞著，《臺灣的橋樑》，頁154。

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將在宗主國日本所習得的西方近代建築結構技術，引入臺灣，其中也包含了先進的橋梁技術。如明治40年（1907）建造舊山線鐵道時，以新的技術興建的苗栗縣魚藤坪龍騰斷橋（圖18）；又如相當具代表性的拱橋昭和5年（1930）興建於跨在基隆河上的第二代明治橋（圖19），皆能展現近代橋梁建築技術對於大跨距的科學性處理技術。

至於臺灣地方工匠自身興建的橋梁，如同位於南投縣國姓鄉北港溪糯米橋的名稱一樣（圖20），在臺灣早期的許多石拱或磚拱橋梁（圖21），相傳是用糯米黏結的，因此常被稱為「糯米橋」。糯米黏著材料，則是由蚵灰、黑糖、石膏粉等原料混合而成。

舉例而言，昭和13年（1938），新竹客運公司於修建關西—馬武督地區道路（即今縣118號道路前身）時，於橫跨馬武督溪上興建一座堅固且寬度可供自動車（汽車）行駛的橋梁「馬武督錦山橋」（圖22、23）。「馬武督錦山橋」建築造型典雅，橋身石材取自馬武督溪的青心石，以人工打鑿成梯形狀石磚，運用紅土

及糯米混和黏著，是以地方上又暱稱為糯米橋。橋身總長度為38公尺、橋面幅寬5.5公尺、弧拱跨距達8.5公尺，據傳負責監督設計的為當時新竹客運公司所聘請的日籍工程師，現場施工則是在當時新埔水汙頭匠師劉春先生的帶領下完成，橋墩豎立在溪底岩盤上，展現出色的建築技術工法。⁴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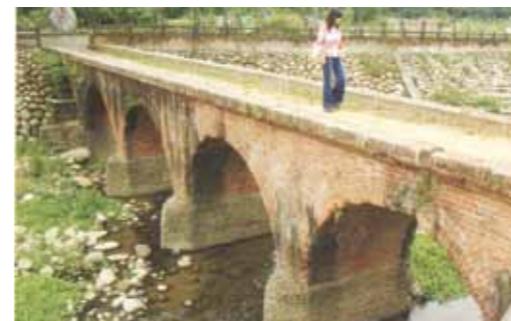


圖21 桃園縣太平紅橋磚造橋，圖片來源：于炳盛、曹永德、王玉瑞著，《臺灣的橋樑》，頁156。



圖22 「馬武督錦山橋」外觀現況，圖片來源：吳瑞真拍攝提供。



圖23 「馬武督錦山橋」橋墩外觀現況，圖片來源：吳瑞真拍攝提供。

45.陳潔，〈關西鎮「馬武督錦山橋」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新竹縣文化局委託，定錨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執行，2018）。



圖24 呈甘橋原貌。橋墩為石材砌築，護欄做酒瓶狀欄杆，橋面以泥土夯實，供人車通行，圖片來源：黃承令計劃主持，《新竹縣定古蹟關西東安橋及歷史建築芎林呈甘橋修復再利用計畫》，頁6-12。



圖25 1996年以前，呈甘橋橋梁的圓拱結構。酒瓶狀欄杆已拆除，改成水平混凝土護欄，圖片來源：黃承令計劃主持，《新竹縣定古蹟關西東安橋及歷史建築芎林呈甘橋修復再利用計畫》，頁6-12。

作為「曉江亭」東寧橋的構築，可以芎林呈甘橋作為比較。其興建年代與規模、結構技術都相近，甚至由其起而呼籲民間善心人士響應與參與，民間共同集資合力興建的石造拱橋，都是由竹東員嶼甘氏宗族帶頭。原為木造「高規橋」的呈甘橋，於大正12年（1923）年改建為石造拱橋。橋長約19.4公尺，橋拱寬3.6公尺，有3個拱洞，中圓拱洞跨徑8.7公尺，兩側圓拱跨徑5.35公尺，橋拱寬度約360公分，欄杆高度110公分，造型優雅，充分展現結構美學（圖24、25）。⁴⁶

呈甘橋橋柱正立面與側立面石塊疊砌是用兩種不同尺寸的石材溝丁疊砌而成，大塊石材長45公分，寬30公分，小塊石材長45公分，寬15公分，以交互勾丁的方式疊砌而成（圖26）。⁴⁷由於呈甘橋兩側增建、拓寬橋梁至近20公尺的結果，使得現況呈甘橋成為三座橋梁所組成，各自有其結構系統，最後三座並置的橋梁以共同補強的鋼筋混凝土橋墩繫於一起（圖27）。⁴⁸

46.黃承令計劃主持，《新竹縣定古蹟關西東安橋及歷史建築芎林呈甘橋修復再利用計畫》（新竹縣：新竹縣文化局，2016），頁6-11~6-12。

47.黃承令計劃主持，《新竹縣定古蹟關西東安橋及歷史建築芎林呈甘橋修復再利用計畫》，頁7-18。

48.黃承令計劃主持，《新竹縣定古蹟關西東安橋及歷史建築芎林呈甘橋修復再利用計畫》，頁7-18~19。

東寧橋與呈甘橋的興建技術工法與規模相近，同樣在橋墩立面以兩種不同尺寸石材砌築而成（圖28），東寧橋的橋墩基座做成三角形分水尖，利於分水，作法質樸（圖29），這在呈甘橋橋墩由於結構補強的關係，目前已無法目視橋墩的原貌做法的情形之下，還保留著過往工匠智慧的真實證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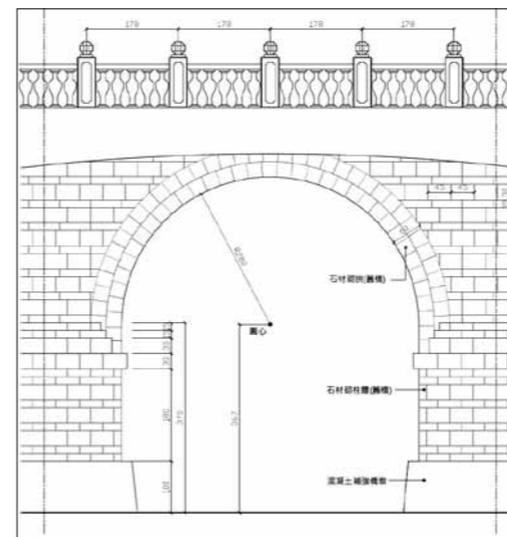


圖26 呈甘橋結構測繪圖，圖片來源：黃承令計劃主持，《新竹縣定古蹟關西東安橋及歷史建築芎林呈甘橋修復再利用計畫》，頁6-12。



圖28 東寧橋橋墩可見石材砌築方法，圖片來源：吳瑞真提供（2017.3.18拍攝）。



圖27 呈甘橋現貌。可以看見石砌橋梁與混凝土橋樑貼附於一起，圖片來源：「〈北部〉芎林呈甘橋暫定古蹟」，《自由時報》，2012.4.6。



圖29 東寧橋橋墩基座三角形分水尖作法，圖片來源：吳瑞真提供（2017.3.18拍攝）。

2. 臺灣拱橋結構技術的先行案例

就如現存不多但真實存在的拱橋案例，不禁令人好奇臺灣工匠擁有的拱橋結構是從何處學來的？現存臺灣建築設施裡，壯麗顯眼的臺灣城門的門洞，便是以拱型的建築體，重要案例如現存的臺南大東門與大南門。從現存的石造拱券城門洞，及清代地方志中，追溯它們的興建年代：

臺灣縣城：東倚層巒，西迫巨浸。雍正元年（1723），臺灣知縣周鍾瑄創建，以木柵為城，周二千六百六十二丈（約8,518.4公尺），設東、西、南、北大門四，東、南、北小門三，各建臺，臺上建樓。雍正十一年（1733），總督郝玉麟、巡撫道國麟令周植刺竹。乾隆元年（1736），易七門以石雉堞，打鐵皮樓護女牆，為警鋪十有五。⁴⁹（圖30、31）



圖30 乾隆元年（1736）興造的臺南府城（縣城）大東門，圖片來源：吳瑞真拍攝提供。



圖31 乾隆元年（1736）興造的臺南府城（縣城）大南門附屬甕城門，圖片來源：吳瑞真拍攝提供。

49.（清）陳壽祺纂，魏敬中重纂，《福建通志臺灣府》「城池」，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84種（臺北市：臺灣銀行發行，1958.10），頁93。

鳳山縣城：……以（道光）五年（1725）七月經始，六年（1826）八月工竣。為石城，周八百六十四丈（2,764.8公尺），高一丈四尺（4.48公尺），基廣一丈五尺（4.8公尺），面廣一丈三尺（4.16公尺），女牆一千四百六十有八，並築水洞以通城內之水，仍舊闢四門，建敵樓、砲臺各四。⁵⁰

彰化縣城：……嘉慶十四年（1809），士民請造磚城，知縣楊桂森倡捐創築，周九百二十二丈二尺（2,951.04公尺），高一丈二尺八寸（4.1公尺），基厚一丈五尺（4.8公尺），面廣一丈（3.2公尺），建城樓四、砲臺十有二、堞七百八十有三、水洞六、守城兵房四。八卦山仍建寨設兵。⁵¹

淡水廳城：在竹塹。雍正十一年（1733），同知徐治民環植刺竹，周四百四十丈（1408公尺），設東、西、南、北四門，各建樓。乾隆二十四年（1759），同知楊愚於四城門各增建砲臺一。道光七年（1827），署同知李慎彝勸捐，創建石城。⁵²

據《福建通志臺灣府》的記載，臺南府城門在乾隆元年（1736），將城門改建為石城門；鳳山舊城門於道光6年（1826）8月石城門竣工；嘉義縣城於嘉慶14年（1809）建造磚城門；淡水廳（新竹）城於道光7年（1827）創建石城門。若按照臺灣石城門門洞的興建年代，最早是1736年的臺南府城門。這些城門樓或許有專門的設計者指導，但在建造過程中，其砌石造拱的技術，將留在臺灣民間匠師身上。因此，若匠師們要興建類似上述的北港溪糯米橋、桃園縣太平紅橋磚造橋、馬武督錦山橋、呈甘橋、東寧橋等拱橋，在技術的習得上，應該是存在過實際建造的實例可以作為觀摩。

不過，儘管臺灣匠師可以從臺灣的歷史名城城門樓的興造學習技術，但那畢竟

50.（清）陳壽祺纂，魏敬中重纂，《福建通志臺灣府》「城池」，頁93-94。

51.（清）陳壽祺纂，魏敬中重纂，《福建通志臺灣府》「城池」，頁95。

52.同上註。

是不同的建築類型轉化的間接學習，以下，就文獻的搜尋，看看是否在臺灣可以找到實際石拱橋案例的蛛絲馬跡。首先的案例，僅是一個計畫案。光緒7年（1881）12月06日劉璈（1829-1887）曾在查察彰化撲子口等處地形時，就跨越大甲溪的石拱橋計畫，留下以下記載：

筋往大甲溪上撲子口，察看水勢及涑東一帶地方情形，……。該處與土名翁仔地方毗連之間，兩岸均有石腳，原係沙石結成，雖不甚堅，溪水從未衝塌，似尚可靠。自南至北，計長一百零四丈（約332.8公尺），擬建石拱橋一道，分作十數甕，每甕約寬六、七尺（約1.92公尺-2.24公尺），高五丈（約16公尺）之譜；須僱內地慣造拱橋之石匠到地審量，方可定局。橋裏陪石，本地尚可採辦；其作甕披尖露面各石料，須赴內地採運。約估工料經費，總在十數萬金。惟諮詢鄉耆，該處溪口較窄，每遇山水暴發，時有大小樹木隨波捲下，勢甚洶湧。……⁵³

劉璈踏勘彰化撲子口後，計畫在其北邊與翁仔間的大甲溪上興建石拱橋。文中「每甕約寬六、七尺」的「甕」，參照文獻所載，位於南京市秦淮區紅花街道光華門外，修建於明正統5年（1440），擁有7個拱洞的石橋「七橋甕」。⁵⁴而彰化的「撲子口／翁仔橋」石拱橋，乃是分作「十數甕」，亦即計畫做出10餘個圓拱洞的石拱橋。文中稱每甕寬6-7尺（1.92-2.24公尺），這座橋有10數甕，如此計算，橋的長度與332.8公尺不合，應是「6-7丈」（19.2-22.4公尺）之誤。

這座橋梁的興建沒有具體實踐，但有趣的是，就劉璈所指，19世紀末的臺灣，還不存在疊砌拱券的技術，必須從中國聘任工匠前來測量規劃；而石材的應用，陪

53. (清) 劉璈，《巡臺退思錄（第一冊）》「三、稟奉查勘彰化撲子口等處地形由（光緒七年十二月初六日）」，臺灣文獻叢刊第21種（臺北市：臺灣銀行，1958），頁6-7。

54. 〈中國古代拱橋傑作——七橋甕，唯一用「甕」而不是「橋」來命名的古橋〉，登載於《每日新聞》，2018.9.17，網址：<https://kknews.cc/culture/bgqej59.html>（2020.3.30瀏覽）。

襯填實的石材雖可就地取材臺灣，但是拱券面的石材，也要採自中國。劉璈實際從事恆春城與臺北城的規劃與建造，他的見解有一定真實性。

只不過，「撲子口／翁仔橋」是一座長332.8公尺，10數個拱洞的巨大規模橋梁，每一個拱洞跨距約21公尺，與東寧橋、呈甘橋這種長約19.4公尺，3個拱洞，中圓拱洞跨徑8.7公尺的小橋不同。臺灣工匠因此無法規劃設計「撲子口／翁仔橋」，並不代表沒有能力建造類似規模的小型石拱橋。清末鄭鵬雲與曾逢辰纂輯的《新竹縣志初稿》中有如下的記載：

浦仔橋（改名萬年橋）在縣北南雅莊，距縣治三里（1728公尺）；為塹城往臺北通衢。道光二十一年（1841），竹塹社屯弁錢茂祖創建。同治七年（1868），同知嚴金清暨紳董林福祥等捐資改建。石橋長一丈八尺（5.76公尺）、寬八尺（2.56公尺）；其下疊石為圓洞，橋上翼以扶欄（有碑）。光緒十三年（1874），邑紳鄭如蘭、吳逢沅、張英聲等重修。⁵⁵

這座位於新竹市北邊南雅莊的石橋浦仔橋（後改名為萬年橋），在1868年興建完成，長5.76公尺，寬也只有2.56公尺，規模並不大，「其下疊石為圓洞，橋上翼以扶欄」，唯一座下有圓拱，上有欄杆的石拱橋。

此外，《臺灣南部碑文集成》載有道光2年（1822）〈修造老古石街路頭碑記〉：

一、建造石橋，計二十五曠，長四十四丈四尺（約142.08公尺），原為貨物出入及人眾往來之便；該橋上不許堆積物件並粗硬等貨。擊折橋石者，就該舖是問，立即買補；違者，聞眾議罰。⁵⁶

55. (清) 鄭鵬雲、曾逢辰纂輯，《新竹縣志初稿》「卷一」「建置志」「橋梁」，臺灣文獻叢刊第61種，頁31。

56. 〈修造老古石街路頭碑記（道光二年）〉，《臺灣南部碑文集成》「甲、記（中）」，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218種（臺北市：臺灣銀行，1977），頁220-223。

這裡的「二十五曠」，要如何解釋呢？這裡的石造設施被稱為石橋，其實是碼頭護岸的構造物，長有達到142公尺石造護岸，將文解釋成有25個拱洞，則每一拱洞圓徑有約5.68公尺。這與現存的呈甘橋、東寧橋的圓徑長短也不相上下。

另一則有趣的文獻，是在17世紀前後，擁有中國南北豐富旅行經驗的知識份子陳第，⁵⁷認為這種拱橋技術屬於中國南方的技法。其實，就如上述，在河北省趙縣安濟橋與滄縣登贏橋，它們的存在可以說明在7世紀的中國北方，已發展出達到非常高技術而優美境界的拱橋。在國學者金雲銘（1904-1987）所撰的《陳第年譜》文中如下的陳述：

萬曆七年己卯（1579），先生（陳第）39歲。春2月，建潮河川石橋。以北方匠人不知建鉅橋之術，特征閩匠舉建平橋7洞，展28丈（約89.6公尺）。按是役先生提調，與有功焉。⁵⁸

陳第在16世紀末，參與北京市密雲縣東北古北口鎮南的潮河川石橋建造時，指出中國北方匠師興建鉅橋技術，特別徵來福建石造匠師，興建約90公尺長，上為平地，下有7個拱洞的石橋，每一個拱洞徑約為12.8公尺，這也就是為何陳第認為拱橋是福建南方的造橋技術。

陳培桂於同治10年（1871）編纂的《淡水廳志》收錄淡水廳至臺灣東北宜蘭開闢道路計畫書〈淡蘭擬開便道議〉文中，出現如下陳述：⁵⁹

57.陳第（1541-1617），曾在萬曆30年（1602）冬天，隨著明朝將領沈有容（1557-1628）帶軍駐紮大員（今臺南市安平區「臺江內海」）20多天之際，前來臺灣。他曾根據台灣當時的原住民風土民情寫成《東番記》（萬曆癸卯春纂）一文。

58.金雲銘著，《陳第年譜》，臺灣文獻叢刊第303種（臺北市：臺灣銀行，1935年），頁32-33。

59.陳培桂（1871），《淡水廳志》「淡蘭擬開便道議」「卷二志一」「封域志疆界（道路附）」，臺灣文獻叢刊第172種（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頁26。

五里烏塗嶺腳，有內陂，水淺，宜石橋（約長五丈許；16公尺），山路宜修。五里頂雙溪（水底碎石多稜），宜石橋（約長七丈許；22.4公尺）。山路樹木蒼蔚）

1871年，計畫於五里烏塗嶺腳與五里頂雙溪，分別提議構築長約16公尺與約22.4公尺的石橋。這裡並沒有言明採用石梁結構或是拱結構，但是對於這種長度的石橋，不可能採用單支石梁橫跨。另一方面，既然需要築造橋墩，那麼19世紀中葉臺灣所擁有的造橋技術，當然不會是如明治34年（1901）的鐵橋技術，也不會是豎立鋼筋混凝土橋墩技術，而是以設計成為圓拱結構石橋的可能性最大。

綜上所述，橋梁的構造系統，在臺灣民間還沒有灌注鋼筋混凝土橋梁結構技術之前，工匠手上僅有木石結構可以選用。因此，為了解決樹杞林街、軟陂莊往上公館莊，連結員峴仔莊、花草林莊、軟橋莊、燥樹排莊、田寮坑莊、上坪莊的交通聯繫迫切的問題，加上「中阻一溪。度以木橋。然易朽損。數歲一易」，自然就會有當地居民「甘承宗、邱騎鵬二氏。因倡勸各地慈善家。集金約萬圓。鳩工度材。改築石橋」。大正14、15年（1925-26）的臺灣，以當時工匠所擁有的造橋技術，要興造長約19.4公尺，一勞永逸的石造橋，必然就如同新竹在同治7年（1868），興造的滴仔橋「其下疊石為圓洞，橋上翼以扶欄」，為一座石拱結構的東寧橋。

石砌橋梁將自然石材透過人的智慧與技術轉化，成為一座具有交通建設現代化意義的橋梁，拱形結構所具備的建築技術與結構美學，反映了當時技術層面的水準。石砌拱橋所具有的拱型古典美學，是現代橋梁技術發展的根源。就地方歷史進程而言，橋梁作為交通設施，聯繫起山林與城鎮，在殖民政府推行產業政策，發展山林墾拓事業方針之下，對促進地方社會邁向現代化發展有其意義。



圖 32 曉江亭內部，圖片來源：吳瑞真提供（2017.3.18 拍攝）。



圖 33 曉江亭內水缸，圖片來源：吳瑞真提供（2017.3.18 拍攝）。

（二）曉江亭的建築風格

1. 曉江亭的「茶亭」機能

一般而言，建築樣式風格是建造者的意圖與其機能的具體化表現。在此想要對曉江亭興建的目的作一整理。前文曾經提及，根據《臺灣日日新報》所載的兩則訊息，亦即〈東寧橋竣工〉與〈東寧橋落成徵詩〉，曉江亭及福德祠的興建，與東寧橋有非常密切的關連，其中建亭是爲了作爲「碑亭」與「茶亭」而興建的建築。

儘管上述文獻沒有清楚指出曉江亭的供茶的茶亭特質，但自小居住於東寧橋畔，高齡90餘歲的地方耆老李增昌先生指出，曉江亭興建之後，居民在自家煮茶，從家裡挑到曉江亭，倒至茶水缸裡（圖32、33），茶水缸下方有一龍頭，旁邊有竹製的杯子，從山上工作下山的工人、路過的行人、挑菜到竹東街販賣的攤販等等，路經曉江亭，可以在這裡稍微喝茶休息。但後來，因爲水缸附設於壁上，使用起來並不方便，李氏表示，在他記憶裡，大家是直接把大茶壺直接放置在水缸之上，不會再把茶水倒入水缸之中。後來，隨著在地交通形式的改變，客運發達，取代步行之後，曉江亭的亭等功能減弱，駐足曉江亭休息的人逐漸減少，居民也不再奉茶於亭中，曉江亭作爲茶亭的使用機能就結束了。⁶⁰

60. 訪談李增昌先生所得，訪談日期：2019.2.27，訪談地點：竹東李宅。

（1）《臺灣日日新報》如何描述「茶亭」

不過，令人疑惑的是，爲何《臺灣日日新聞》所載的〈東寧橋竣工〉〈東寧橋初渡式〉與〈東寧橋落成徵詩〉文中，沒有述及曉江亭作爲茶亭，也缺乏居民奉茶的行爲描述？《臺灣日日新報 大鐸版》⁶¹ 中以「茶亭」⁶² 之名作爲報導陳述訊息有18件之多，總述其所陳述的「茶亭」有如下的幾種機能：一般性的茶亭有3件⁶³、公園內作爲遊園與構成景觀元素之一者有3件⁶⁴、作爲餐廳料理店的指稱者有6件⁶⁵、作爲詩詞文學表現者有4件⁶⁶、作爲救濟貧窮無三餐溫飽人家的「設廠

61. 大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系統製作，《臺灣日日新報 大鐸版》（日據時期（1895-1945）線上資料庫）（桃園：得泓資訊公司，2005）。

62. 因爲「茶亭」這種建築類型有機能多樣化的情形，本文用「茶亭」表現廣義的意思，亦即包括一般興建於來往道路途中，作爲來往行人休憩、欣賞風景、吟詩題字，病友當地居民熱心供應茶水的茶亭之外，還扮演其他建築功能的建築。若以狹義的一般性的建築，則不加「」的茶亭來表現。

63. 〈片善足錄〉，登載於《臺灣日日新報》（1913.6.17），版6。〈新竹短訊 善繼父志〉，登載於《臺灣日日新報》（1921.6.18），版4。〈屏東 茶亭新設〉，登載於《臺灣日日新報》（1928.4.19），版4。

64. 〈詩壇 東京畿紀游吟草（九）游前清三貝勒共建之萬生園內附苗圃茶亭動物園〉，《臺灣日日新報》（1916.1.7），版6。〈屏東希望社の聯盟旗樹立式〉，《臺灣日日新報》（1930.3.3），版5。〈官吏獻上の御茶亭に 聖上親しく御命名 花陰亭、澄空亭、嚶鳴亭の三亭 御命名の御縁り〉，登載於《臺灣日日新報》（1930.7.2），版7。

65. 〈雨中の舟車 領公圳竣工式の光景 魚取り〉，登載於《臺灣日日新報》（1909.5.11），版5。〈榕垣紀事 禁紅纓帽〉，登載於《臺灣日日新報》（1915.5.27），版6。〈榕垣紀事 團體問題及閩省〉，登載於《臺灣日日新報》，（1915.11.21），版6。〈榕垣紀事 市政局折燬廣隆穹〉，《臺灣日日新報》（1917.12.19），版6。〈榕垣紀事 飭修馬路〉，登載於《臺灣日日新報》（1919.4.1），版6。〈領案取下〉，登載於《臺灣日日新報》（1931.11.28），版4。

66. 〈烏捷 枯野〉，登載於《臺灣日日新報》（1907.12.29），版1。〈蒙汀 一柿庵偶會 散紅葉〉，登載於《臺灣日日新報》（1908.2.7），版1。〈時事韻語小十八公 惑星會〉，登載於《臺灣日日新報》（1925.8.6），版3。〈吉本 紅墩 臺日歌壇 谷間ゆ上る〉，登載於《臺灣日日新報》（1925.10.19），版3。

施粥」場地者1件⁶⁷，記載茶亭的佛教宗教意義，於佛寺或是個人家屋前面，泡茶施予行人的「攝待」、「鬥茶」儀式者1件。⁶⁸ 其中對於一般性的茶亭的報導，如1913年6月17日〈片善足錄〉陳述：

南日本製糖會社員郭墻氏。竹人所稱 有數之慈善家也。手建五箇茶亭於埔頂客溪等處。前新竹縣知事櫻井公。嘗題詩勒石。讚美其事。近復投巨資。專為貧苦者施療。特選西醫陳光石氏。為囑託醫。……⁶⁹

本文所指的，或許正是一般所認識的，純粹讓人休憩用的小亭子。又，1921年6月18日〈新竹短訊：善繼父志〉則陳述：

新竹街崙子保保正郭標。其先父郭墻在日。於通行要路。創設茶亭幾處。一到暑天。即僱人烹茶。以待往來行人。茲郭標仍舊如例。以繼父志云⁷⁰。

其次是1928年4月19日〈屏東：茶亭新設〉的陳述：

屏東街。年來為地方發展起見。一時街內。再開業店鋪者。凡數十處。最近又再新設茶亭三所。往來旅客。便之。既報。屏東郡下。壯丁團檢閱一事。其優勝旗一旒。乃係邱阿春寄贈。誤植為馮安德氏。附此訂正⁷¹。

據此可以確認，在東寧橋相關報導中，雖未對曉江亭直接名之以「茶亭」這個用詞，但也確實採用了其他一般性茶亭的敘述內容與方式，說明曉江亭的建築機能特質，確認了曉江亭的確就是一棟不折不扣的「茶亭」建築。

(2) 臺灣文獻叢刊史料所描述的「茶亭」

67. 〈設廠施粥〉，登載於《臺灣日日新報》（1901.5.19），版6。

68. 〈李坪 水引草（三）攝待〉，登載於《臺灣日日新報》（1906.9.15），版3。

69. 〈片善足錄〉，登載於《臺灣日日新報》（1913.6.17），版6。

70. 〈新竹短訊 善繼父志〉，登載於《臺灣日日新報》（1921.6.18），版4。

71. 〈屏東 茶亭新設〉，登載於《臺灣日日新報》（1928.04.19），版4。

同樣地，《臺灣文獻叢刊》⁷² 中載有19件對於茶亭的文獻記載（扣除重複者2件），若暫時不論琉球者4件，將剩餘15件文獻，按其「茶亭」則可分為一般性的茶亭有4件⁷³、軍事設施者有3件⁷⁴、佛教寺院中的設施者有3件⁷⁵、園林裡作為遊園與構成景觀元素之一者1件⁷⁶、交通節點者1件⁷⁷、環境風景裡的一景者1件⁷⁸、被視

72. 周憲文主編，金臺灣資訊事實公司規劃設計，《臺灣文獻叢刊 合訂本（全文）（圖像）光碟 檢索資料庫（線上資料庫）》，臺北市：大人物，2000。。

73. 橫所編纂，《臺灣詩乘》「臺灣詩乘卷六」，臺灣文獻叢刊第64種，1921，頁260-261。
陳朝龍纂輯，《新竹縣採訪冊》「新竹縣採訪冊卷五」「目錄：碑碣（下）竹塹堡碑碣（下）」，臺灣文獻叢刊第145種，1894，頁221。

陳朝龍纂輯，《新竹縣採訪冊》，頁235-236。

沈茂蔭編，《苗栗縣志》「苗栗縣志卷二 封域志」「山川」，臺灣文獻叢刊第159種，頁27

74. (清) 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29種，臺灣銀行發行，頁49。

(清) 陳壽祺纂，魏敬中重纂，《福建通志臺灣府》「兵制」，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84種（臺灣銀行發行，1958年10月），頁271。

羅大春撰，《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308種，臺灣銀行發行，頁54。

75. (清) 王禮主修，《臺灣縣志》「雜記志九：寺廟」，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103種（臺灣銀行發行，康熙59年（1720）），頁211-212。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私法人事編》「第一章人；第二節品性；第三款宗教；第一宗教之法規」，臺灣文獻叢刊第117種，臺灣銀行發行，頁220-221。

《遇變紀略》「滄洲紀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249種，臺灣銀行發行，頁31頁。

76. 許南英，《窺園留草》「窺園留草：己酉五十八首」，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147種（臺灣銀行發行，1958.10），頁80。

77. 沈茂蔭編，《苗栗縣志》「苗栗縣志卷二 封域志：道路」，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159種，臺灣銀行發行，頁19。

78. 連橫，《雅堂文集》「雅堂文集卷四：詩薈餘墨」，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208種，臺灣銀行發行，頁297。

為一個行為人的團體單位者3件⁷⁹。其中作為交通節點者，或許可以併入一般性的茶亭討論。

新竹北埔墾紳姜奠邦之孫姜紹祖興建的鹿寮坑茶亭，《臺陽詩話》稱：

鹿寮坑茶亭頗壯麗，為姜贊堂二尹（紹祖）所建。其楹柱皆白石為之，鐫聯云：『雖非廣廈遮寒士，亦效環滁築醉翁』；『此外程途多未歷，個中甘苦貴親嘗』；『不借望梅能止渴，得些息足自添神』；『花香鳥語蒼崖畔，帽影鞭絲大道旁』。⁸⁰

針對姜紹祖興建的茶亭，在連橫編的《臺灣詩乘》亦有提及：「（江紹祖）曾建茶亭於鹿寮坑，以息行人」。文獻稱蓋鹿寮坑茶亭「以息行人」，又「頗壯麗」，這與曉江亭「亦甚幽雅」，又「以為休憩之所。此不獨便利行人。凡遠近人士。春秋佳日。夏時納涼賞月。倍添景趣。」甚為近似。

接下來，可以舉出收錄於《新竹採訪冊》的兩塊茶亭碑記，一是光緒12年（1873）陳傳龍、黃榮和等人所立的〈三叉嶼茶亭碑〉，記述著：

在縣南二十四里（13.824公里）。……從來築道捐金，全仰有夷之行；造石渡路，用昭無量之德。茲我三叉凸等莊，乃本山林嶇嶺，又兼出入要地。欲修平石路，不歎行人跋涉之難；然而工費浩大，非一人之能為！惟我聯莊人

79.《臺灣南部碑文集成》「甲、記：甲、記（中）；建造天后宮碑記（嘉慶八年）」，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218種，臺灣銀行發行，頁171頁。

《臺灣南部碑文集成》「甲、記：甲、記（下）；捐修天后宮芳名碑記（咸豐二年）」，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218種，臺灣銀行發行，頁299。

（清）周璽，《彰化縣志》「彰化縣志卷四 學校志：書院（社學附）」，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156種（臺灣銀行發行，道光20（1842）），頁147。

80.（清）王松，《臺陽詩話》「臺陽詩話下卷」，臺灣文獻叢刊第34種（臺北市：臺灣銀行），頁50-51。

連橫編纂，《臺灣詩乘》「臺灣詩乘卷六」，臺灣文獻叢刊第64種（臺北市：臺灣銀行，1921），頁260-261。

樂助捐資，集腋成裘，所以能勦盛事，往來無不感德者矣⁸¹。

另一塊茶亭碑記是在光緒16年（1877）11月1日，由陳朝綱所撰寫的〈犁頭嘴山茶亭記〉，文中陳述如下的內容：

在縣東十二里（6.912公里）犁頭嘴山。竊思犁頭山北一帶長途，四方接跡，上通淡水、下抵竹垣；已多車馬往來，不乏旅商負載。吾於此久欲建茶亭一所，以為駐足之區。雖數年以來有志未逮，而予心終不能忘。茲庚寅（1877）之歲十月既望，爰鳩工架造，並施薄田數畝以備湯資。則雖不能如義漿之重、仙露之甘，使七碗分來，已足解其煩渴；數椽蔽處，尤堪避乎雨風。其於吾當日之心，已可稍慰矣。至謂此亭足與蘇公之「喜雨」（蘇軾的「喜雨亭記」）、廬陵之「醉翁」（歐陽修的「醉翁亭」）並垂不朽也，則吾豈敢！是為註。光緒十六年冬月吉旦，里人陳朝綱撰。⁸²

〈三叉嶼茶亭碑〉碑文指出三叉嶼茶亭位於「山林嶇嶺，又兼出入要地」之山麓重要位置，並且將茶亭的興造視為與造石渡路、修平石路為整體的複合式工程，也因為聯莊眾人共同樂助捐資完成的道路與茶亭建築工程，可使行人不嘆跋涉之難，是可以充分理解茶亭作為行人來往通行解渴、休憩場所的意義。而〈犁頭嘴山茶亭記〉說明作為茶亭位置立於「四方接跡，上通淡水、下抵竹垣；已多車馬往來，不乏旅商負載」，接通四方，又是車馬人員往來頻繁之處。為的是讓人有「駐足之區」，提供茶水，以解旅途中人的煩渴。

另一件案例是記載於《苗栗縣志》內，簡明扼要地闡述位於城南6里（3.456公里）的平頂嶺上的茶亭。亦即「其嶺上平原數里；建有茶亭，以為挹爽迎薰之所，

81.陳朝龍纂輯，《新竹縣採訪冊》「新竹縣採訪冊卷五」「目錄：碑碣（下）竹塹堡碑碣（下）」，臺灣文獻叢刊第145種（臺北市：臺灣銀行，1894），頁221。

82.陳朝龍纂輯，《新竹縣採訪冊》「新竹縣採訪冊卷五」「目錄：碑碣（下）竹塹堡碑碣（下）」，臺灣文獻叢刊第145種（臺北市：臺灣銀行，1894），頁235-236。

行人頗有利焉」的陳述。

(3) 小結

查詢《臺灣日日新報》或是臺灣文獻叢刊史料對「茶亭」建築的設置地點、建築功能、建築樣態的描述，可以確認曉江亭建築是一座「茶亭」建築。然而，東寧橋報導中，在描述曉江亭時，卻沒有以「茶亭」兩字來指稱，甚至也未曾提出設置有專為奉茶而作茶缸，也未出現「曉江亭」的名稱，這些現象確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

在〈東寧橋落成徵詩〉、〈東寧橋竣工〉、〈東寧橋初渡式〉報導裡，曉江亭被強調的是其作為「碑亭」的功能，雖然文中如實地描述了它作為「茶亭」的所有建築特徵，但是卻不用茶亭稱它，對於此點，仍無法有完全的理解。

2. 曉江亭的建築風格

(1) 前後兩坡水屋頂的臺灣一般茶亭建築

在考慮曉江亭建築風格時，不能忽視其作為「茶亭」的建築特質，在此就來檢視臺灣的現存茶亭建築。就文獻所載，目前所知最早的茶亭記錄，是光緒12年（1886），位於新竹縣寶山鄉三峰村的〈三叉嶼茶亭碑〉，可惜建築已經不存。

臺灣新竹、苗栗一帶客家山區仍有多例茶亭建築，⁸³ 如大正12年（1923）興建，已指定為縣定古蹟的苗栗大湖十分嶼茶亭，及新竹縣峨眉鄉四份子茶亭、六寮茶亭、水流東口茶亭、東城茶亭，位於新竹縣峨眉鄉與北埔交界的暗窩茶亭、北埔鄉下大湖黎屋茶亭、寶山鄉油田老欖木茶亭、石坪茶亭、新竹縣橫山鄉大山背茶亭、苗栗縣三灣鄉鼓山下茶亭，與新竹縣寶山鄉八股茶亭、寶山鄉冷水崎茶亭13

83.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客家文化資產數位網歷史建築，網址：<https://hch.hakka.gov.tw/archive.asp?MType=2>（2020.3.29瀏覽）。在此要注意的是，雖然客家委員會用「軟坡仔茶亭」指稱曉江亭，但是在歷史文獻上是沒有這樣記載的稱呼的。

個案例。其中，有8個案例的屋頂形式為兩坡水屋頂，以造型簡單，單開間的小屋建築為主，建築材料則為磚、石砌造，大部分都是興建於1950年代-1960年代的茶亭。

採用較為特殊的屋頂形式者有冷水崎茶亭，採用了歇山形式的屋頂。而民國56年（1967）所建的北埔下大湖黎屋茶亭，則可見平頂出簷與雙坡水屋宇的共同構築關係。其他採用平頂屋頂樣式的茶亭者，有東城茶亭（約建於1961年，2001年改建為加強磚造結構）、峨眉與北埔交界的暗窩茶亭（約建於民國40-50年代（1950-1960），於民國80年（1991）改建為加強磚造一樓建築）。

以位於關刀山脈海拔約545公尺之處的苗栗大湖十分嶼茶亭為例（圖34），其所在位置位於十分嶼山南麓鞍部，過去為「挑鹽古道」、「挑筍古道」。古道沿途過去有4處茶亭，由西往東分別是三義雙龍坡磚造屋頂茶亭、十分嶼鞍部石頂茶亭、南湖坑自然樹蔭的樹茶亭、永興橋下方50公尺處的竹棚架茶亭等。⁸⁴

十分嶼茶亭由在地人劉來旺，向十分嶼、九份庄、南湖坑住民發起興建，由在地匠師廖阿榮負責興建完成。劉來旺長孫莊德文回憶說，劉來旺祖父年少家貧入贅莊家，大正初年到苗栗南湖開墾，本來焗樟腦，樟樹砍盡後改種田，因十分嶼聚集



圖34 苗栗縣大湖鄉十分嶼茶亭，圖片來源：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網站，網址：<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advanceSearch/monument/20010516000001>（2020.4.30瀏覽）。

84. 參看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網站，網址：<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overview/monument/20010516000001>（2020.4.29瀏覽）。

庄民日漸增加，祖父因而發起募款建茶亭，完工時，入口石碑畫有路標、捐款人芳名錄及「大正十二」年（1923）字樣，亭內本有圓石桌，但已佚失。⁸⁵ 茶亭以砂岩砌牆，屋頂坐兩坡水硬山式，現內有石砌爐灶、不過由於未經調查研究，不知是否為原貌或後來修復時再行施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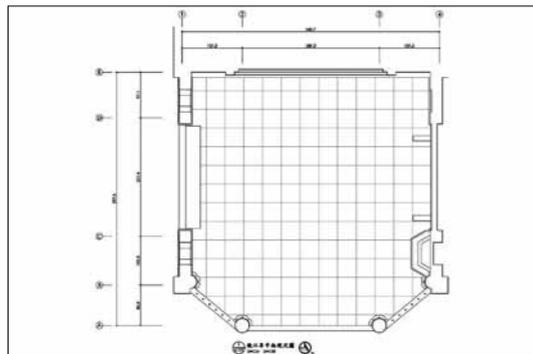


圖35 曉江亭內部平面圖，圖片來源：陳華興繪製，《縣定古蹟竹東曉江亭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新竹縣文化局委託，承熙建築師事務所執行，2020.5，頁3-14。



圖36 曉江亭牌樓面，圖片來源：吳瑞真提供（2017.3.18拍攝）。

這些茶亭內，大都置有長椅，供路人休息。茶亭還有一重要設施，亦即茶水缸的設置。上述的茶亭案例中，擁有茶亭者有暗窩茶亭（茶水缸）、石坪茶亭（石陶茶水缸）、水流東口茶亭（茶水缸）、北埔下大湖黎屋茶亭（石茶水缸）等四處。雖然水缸之設，容易如曉江亭的茶水缸，因為衛生、不方便飲用、用水泥製作的茶水缸，維修不易，棄茶水缸不用。

(2) 擬洋風建築樣式的曉江亭

透過上述實際案例的查閱，幾乎大部分案例是採用臺灣傳統建築裡，最簡單的單開間兩坡水的小屋建築類型。曉江亭的建築樣態顯得華麗而別具一格（圖6、35、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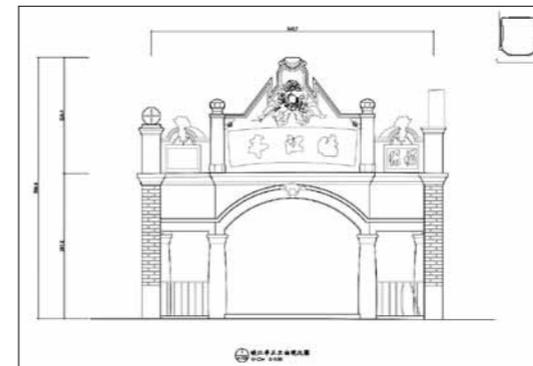


圖37 曉江亭右側牌樓面，圖片來源：陳華興繪製，《縣定古蹟竹東曉江亭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新竹縣文化局委託，承熙建築師事務所執行，2020.5，頁3-44。

37)。這或許因為曉江亭的興建被視為與東寧橋是一體的營造工程有關，它除了扮演一般性的茶亭建築機能角色之外，還作為置放勒刻捐助建造東寧橋者名單、功德與徵詩佳作石碑的這層意義，換言之，表現出其作為「碑亭」功能特質之表現。

為了扮演這種「茶亭」與「碑亭」雙面的角色，施作的匠師除了磚砌擬西方建築之種種作法，如多立克

柱式（Doric）、極簡化帶狀裝飾（frieze）、楣梁（architrave）與柱形為梭柱曲線（entasis）、華麗的女兒牆裝飾（parapet）及山牆立面裝飾（pediment），建築本體表面磨石子、粉灰之外，還特別了採用新的鋼筋混凝土拱梁建築技術。

曉江亭座西南朝東北，臨東寧路二段之入口為東北方；原為兩前後兩坡水的屋頂被牌樓面環繞，前方為臨路面，中央做以長圓弧拱，兩側斜往後收縮，左右兩面則垂直於路面向後接續亭後壁。

據李增昌先生所知，大正15年（1926）落成的曉江亭，原本屋頂是兩坡水屋頂形式，周圍再做出牌樓面環繞，約在30年前由於屋頂毀壞，拆掉了木構與瓦片，改成現在的水泥屋頂樣式。⁸⁶

曉江亭的建築工法以傳統磚砌為主，並在磚砌屋身之上，再砌以磚造牌樓面，上面施以洗石，形塑出石造的質感。在西式牌樓面上，以泥塑做出西式的花草語

85. 目前已經復舊重置。參看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網站，<<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overview/monument/20010516000001>>。

86. 訪談李增昌先生所得，訪談日期：2019.2.27，訪談地點：竹東李宅。

彙，同時也由竹東書法家彭鏡泉題書「曉江亭」亭名與「枕渚」「濯月」書法⁸⁷，表現出在地的文風。牌樓面佔亭整體比例略大，上方山牆線條斜率較大，顯得線條較為銳利，比例上並非正式西洋建築的作法，而是臺灣工匠對於殖民地所引入的西洋時尚風潮的自我詮釋，可以說是一種臺灣式的「擬洋風」。

「擬洋風」一詞來自於1930年代日人掘越三郎針對日本明治時期開始，至明治20年這短短20年之間，日本所出現的，蘊含西洋品味的建築。藤森照信對於「擬洋風」給予更為清晰的定義，他以「擬洋風」來指稱日本明治時期的洋風建築中，未受過學院訓練，專長於興建日本傳統神社或住宅的傳統匠師，因參與或者觀摩當時西方人在日本興建的西洋建築，由於尚未全面了解，僅擷取西方建築的局部，以傳統日本建築工法，來表現新的建築品味，創造出前所未有的建築形式，而這樣的做法，多應用在當時日本以文明開化為目標所設立的新形態機構，如學校或醫院。⁸⁸

日治時期臺灣，傳統匠師大多沒有進入學院學習建築設計的機會，他們藉由參與殖民政府公共工程的機會，或者透過觀察與模仿產生的心得，將之展現在自己承攬的民間建築工程當中，在民間開出朵朵充滿創意的花朵。這樣的轉化，蘊含了匠師的個人創意，因此產生屬於民間對西方建築的自我理解之後的型態與比例。工匠們對於西方建築形式或裝飾語彙的了解，是一種透過模仿日本建築師的作品而產生的再模仿，是詮釋以後的再詮釋，因之而產生比例獨特的作品，屬於臺灣的擬洋風

87.新竹縣文化局文化資產審議楊鏡汀先生告知大正15年（1926）東寧橋落成，彭鏡泉提詩5首，第四首如下：「煉石誰填海國天，興梁濟世媿先賢；東寧舊號今題柱，我頌天興與萬年。」這首詩道盡東寧之歷史人文，描述明鄭歷史，闡析東寧，最有文學價值的詩篇。鄭成功在台南建立政權，稱為東都，又稱東寧，東都、東寧泛指臺灣。一府二縣，台南府城；嘉義設天興縣；鳳山設萬年縣。

88.藤森照信著，黃俊銘譯，《日本近代建築》（臺北市：五南書局，2014），頁73-126。

樣式。⁸⁹

（三）「曉江亭」福德祠的建築樣式風格

1.「曉江亭」福德祠的功能

前文已經提及福德祠的興建與東寧橋有非常密切的關連。在〈東寧橋竣工〉文中，有「亭畔建福德祠一座。亦悉用琢石造成。互相輝映。頗壯觀瞻。值茲落成之日。有演戲煙火爆揚諸餘興。屆時當有一番盛況云」。曉江亭旁，建造一座福德祠，在東寧橋落成之日，進行演戲發放煙火爆竹來助興慶祝。雖然《臺灣日日新報》稱它為「福德祠」，不過，在地方上，稱它為「茶亭伯公」或「橋頭伯公」。⁹⁰「伯公」是土地公，也就是福德正神。如此更形顯示福德祠與東寧橋間緊密的關係。

橋與祠的關係，可在越南中部的世界文化遺產會安城鎮的「來遠橋」，以及香水縣水清社的「清全橋」看到橋上有廊，廊中有祠的作法。⁹¹在中國有稱「廊橋」、「風雨橋」、「橋屋」等的橋、廊與祠關係的建築類型。最早對這類建築進行調查研究的學者，是在1943年發表〈中國廊橋〉的劉敦楨。⁹²後來，茅以升在1986年主編的《中國古橋技術史》⁹³和田中淡在1990年撰寫的〈鼓樓風雨橋〉⁹⁴等

89.吳瑞真，《空間的肆應——日治時期屏東宗聖公祠與美濃廣善堂傳統祠廟建築中的時代新思維》，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頁3-27~3-32。

90.訪談李增昌先生所得，訪談日期：2019.2.27，訪談地點：竹東李宅。

91.黃蘭翔，〈順化傳統古建築的特徵〉，《越南傳統聚落、宗教建築與宮殿》（臺北市：中研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08.12），頁383-401。

92.劉敦楨，〈中國廊橋〉，收錄於《中國建築史論文選集》第1輯，1982（原載《建築》，重慶中央大學建築系，1943），頁496-501。在此採用了劉敦楨所用的稱呼「廊橋」。

93.茅以升主編，《中國古橋技術史》（北京市：北京出版社，1986）。

94.田中淡，〈鼓樓風雨橋〉，收錄於《住宅建築》181期（東京都：建築資料研究社，1990.4），頁65-71。

人的研究成果面世。綜而言之，廊橋分佈於陝西、甘肅、雲南、貴州、廣西、江西、福建、浙江、江蘇，以及湖南、四川等省分。而現存實物分佈最廣者在湖南西南部與廣西西北部壯族自治區，以及田中淡等人調查的貴州東南部。

劉敦楨認為橋上置廊屋的用途在於「(1) 過旅行人，借避風雨；(2) 商賈走販，依橋設肆；(3) 墨客文人，宴飲酬酢；(4) 避雨遮陽，用護橋木；(5) 構屋固墩，以抗山洪；(6) 常據要津，因置關卡；(7) 翼然水際，天色山林」等項。《中國古橋技術史》除了指稱類似劉氏所稱的理由之外，也指出「因為橋上有了建築，可以休憩，可以設肆，可以供神佛，甚至可以遊宴，於是亦有專為上述橋的附加功能而修建橋上建築，同時對包括橋身在內的橋上建築的形象予以藝術加工」⁹⁵ 現存的中國廊橋的實際建造年代，很少早過清代以前。⁹⁶

從劉敦楨、茅以升、田中淡等人的調查研究，廊橋所具有「可以休憩，可以設肆，可以供神佛，甚至可以遊宴」的功能，其實完全符合「曉江亭」複合建築的亭與福德祠功能。「廊橋」與「曉江亭」一樣存在供佛神的宗教活動層次的意義。

2. 「曉江亭」福德祠建築樣式的正式性

作為祭祀活動的設施，福德祠為石材砌築，從1960年照片中可以發現，當時福德祠旁靠近曉江亭側，還有磚砌金爐，現已不存。福德祠的規模並不大，祠本體寬97公分，深約為98公分；簡化而類似於須彌座的底座寬約171公分，深165公分，高59公分，底座至屋簷高約為91公分，至燕尾頂端約為152公分（圖38~40）。

95. 茅以升主編，《中國古橋技術史》，頁228。

96. 據方擁在1995年《建築學報》第11期（頁55-60），所發表的〈虹橋考〉中，已經考證了於閩浙一帶有不少明清遺構的「廊橋」。方擁指出閩東壽寧縣城內的昇平橋（橫溪橋）創建年代為明天順元年（1457），但是於隆慶5年（1571）與清乾隆43年（1778）有兩次重建。另一仙宮橋（玉帶橋）始建於明代，乾隆43年（1778）重建，1992年重修。在此所稱的「實際建造年代」並非指其創建年代，而是現存遺構的真正興建年代。



圖38 曉江亭旁側福德祠正立面，圖片來源：吳瑞真提供（2017.3.18拍攝）。



圖39 2017年福德祠前方還有錫製香爐，目前香爐已經移走另外放置，圖片來源：吳瑞真提供（2017.3.18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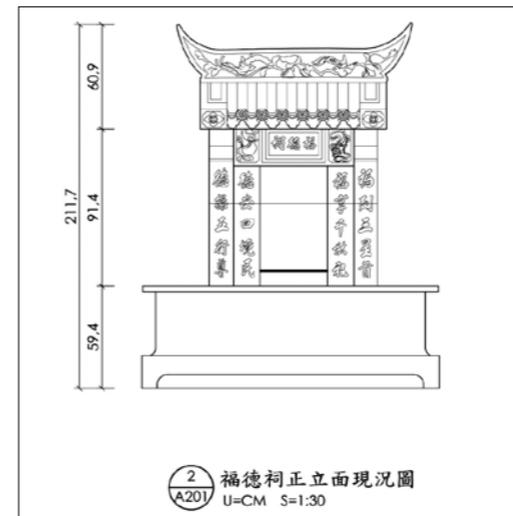


圖40 福德祠正立面現況圖，圖片來源：陳華興繪製，《縣定古蹟竹東曉江亭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新竹縣文化局委託，承熙建築師事務所執行，2020.5，頁3-44。

福德祠的尺寸規模，雖不大，不過，細緻的處理方式，以及起翹的燕尾，卻顯得極為正式。兩坡屋蓋前坡刻畫出筒瓦與板瓦，屋簷端也有瓦當與滴水紋樣，在屋脊處亦刻畫出有象徵「錦上添花」的山茶花與錦雞的圖樣，於歸帶的堵頭及瓦當處也是圖式化的山茶花紋樣。茶花是四季常青，葉片翠綠光亮，寓意無限生機和希望，是吉祥、長壽的意思，也象徵著寧靜安詳、吉祥如意、佛光普照。在福德祠匾額兩端，刻有葫蘆與犀牛角的吉祥圖案。葫蘆寓意救濟眾生和長生不老。民間用

之，取其諧音寓意福祿雙全；另外一端是犀牛角為珍稀銳器，可以辟邪、鎮凶、保平安；犀角為珍貴物品，象徵著富有、尊貴。福德祠正面左、右二側各刻有「福列三星首，德操五行尊」（外）與「福享千秋祀，德安四境民」（內）的二組對聯，門額上中書「福德祠」三個大字。不論是在裝飾、聯對的處理上，都展現了細緻且正式的做法。

這座福德祠規模雖然不大，但是使用形塑出具有非常優美曲線的「燕尾起翹」。盛行於臺灣的民間的燕尾形式，其實是表達社會地位的屋頂形式，隱含了古代長江流域以南至東南亞一帶的建築文化背景的呈現。⁹⁷

(四)「曉江亭」洗衫窟

「曉江亭」現況，福德祠旁有樓梯，拾級而下可以抵達洗衫坑。《樹杞林志》對於洗衫窟（坑）有如下記載：「洗衫坑橋，在樹杞林洗衫坑。光緒二十三年（1897）造。寬二尺四寸（約0.77公尺）、長一丈八尺（5.76公尺）。」⁹⁸《樹杞林志》中所述的洗衫坑，並非東寧橋下的洗衫坑。竹東一帶婦女日常的洗衫，是在河道旁洗衫，並沒有固定的坑窟。早期竹東人所說的洗衫坑，為樹杞林街一帶河流較緩處。⁹⁹（圖41、42）

早期因取用水的關係，河川地、洗衫坑是家戶每日必到之處，也因如此有了彼此互動交流機會。從對居民馮女士與羅女士的訪談知道，傳統上，年初一天公放假，除了不可曬衣物，也不可洗衣，以免驚動水神；年初二起，只要新年度到河邊洗衣的第一天，會準備簡單金香在水邊拜水神。早期喪葬禮俗中，有一項祭水神儀

97.黃蘭翔，〈臺灣漢人建築「燕尾」翹脊之起源與文化初探〉，收錄於《臺灣建築史之研究》（臺北：南天書局，2013.4），頁199-239。

98.（清）林百川、林學源，《樹杞林志》，臺灣文獻叢刊第63種，頁28。

99.訪談李增昌先生所得，訪談日期：2019.2.27，訪談地點：竹東李宅。



圖41 婦女洗衫舊照，圖片來源：〈竹東河畔水文化中興河道洗衫坑的故事〉，「環境資訊中心」，網址：<https://e-info.org.tw/node/111817>（2020. 4.29 瀏覽）。



圖42 東寧橋下洗衫坑，居民洗衫，圖片來源：吳瑞真提供（2017.3.18拍攝）。

式，稱之為祭河公、祭河光或敬河公，以婦人為主，意為向水神稟告，感謝水神一直以來的照顧，並提供水源使用，帶走所有汙穢。現今雖然已不復見此儀式，但是洗衫活動依舊。¹⁰⁰

大約在30年前，東寧橋下修築了貼附磁磚的洗衫坑（洗衫窟），提供居民洗滌衣服的場所。¹⁰¹洗衫窟的出現，或許是居民就近在溪邊、河邊，為直接利用自然水源洗滌，因而設置洗衫坑，成為了竹東中興河道的重要人文景致。而東寧橋一帶，福德祠為地方守護神靈，鄉親們來到這裡祭拜伯公之後，便下東寧橋，至橋下

100.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學前橋下洗衫窟〉，網址：https://archives.hakka.gov.tw/category_detail.php?id=JC1311000173。

101.居民林太太說，東寧橋下早期由他們家隔壁一位阿婆造水窟使用，阿婆經常製做沙包，搬運到河邊駁坎泉水出水口，堆疊圍起成水窟蓄水，但是，經常被大水沖壞，約民國80年（1991）居民決定募款集資，以水泥、石頭砌起固定式水窟。民國90年（2001），附近3戶居民以自費方式，於後段再砌2個水槽（水窟）。參看：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東寧橋下洗衫窟〉，網址：https://archives.hakka.gov.tw/category_detail.php?id=JC1310000026。

的洗衫坑一邊洗衣服，一邊與鄉親話家常，等衣服洗好了，便拾級而上，收拾拜拜的物品之後，隨之返家。這樣東寧橋畔的日常場景，是東寧橋一帶客家鄉親的生活韻律。

五、結論

本文的出發點是企圖思考，超越現代主義理論所構築的市鎮規劃與設計所產生的都市與聚落，重新思考如何理解非在現代主義理念支配下建構的傳統環境。在偶然的機會下，發現了「曉江亭」這個作為環境空間構成的邊緣與節點概念特質，它剛好位於井上道路「通道」(paths)的沿線，又是位於區分兩個街區(districts)，或是穿越作為「邊緣」(edges)的軟陂溪的東寧橋上，它可以被視為如林區所談的市鎮空間五個概念裡的「節點」(nodes)。

經過本文的分析研究知道，這個作為節點的「曉江亭」複合空間的組成裡，東寧橋是最為核心的空間元素。曉江亭、福德祠的建造都是因東寧橋的興建而構築，也同時在大正15年(1926)竣工落成。曉江亭以紀念東寧橋落成，放置勒刻捐助者名單及金額的功德與徵詩意涵、徵詩佳作，扮演了作為「碑亭」的角色。另外它也充分變演了類似臺灣一般「茶亭」的功能，作為便利行人休憩的場所，也與東寧橋同為遠近聞名的知名景點，可以作為每年春節郊遊、中秋賞月，或是夏天納涼之所，更加此地風景的緻趣。

又，與東寧橋的構築有密切相關的福德祠建造，它與曉江亭共同扮演類似，分佈於中國南方至越南等地的「廊橋」、「風雨橋」、「橋屋」之功能。亦即在橋上可以休憩，可以設肆，可以供神佛，甚至可以遊宴。也就是曉江亭可以休憩、可以遊宴，雖然目前沒有設肆，但是並不是表示不行設肆。並且在東寧橋落成之日，在福德祠進行演戲、發放煙火、施放爆竹以慶祝東寧橋的落成。不但讓東寧橋與曉江

亭的設計施工建造可以成為遠近聞名的場所，而且用福德祠土地公作為守護東寧橋的土地神靈，進行宗教祝賀竣工的信仰儀式。

至於「曉江亭」的主角東寧橋，在當時樟腦、糖業、天然氣、石碳/石灰石礦物開採運輸之需要下，為要解決樹杞林街、軟陂莊往上公館莊，連結員嶼仔莊、花草林莊、軟橋莊、燥樹排莊、田寮坑莊、上坪莊的交通聯繫道路與輕便鐵道鋪設迫切的問題。不但建造經費是由甘承宗、邱騎鵬等地方仕紳與知識份子們，延續清代以來地方菁英造橋鋪路的公益精神，帶頭呼籲勸捐，募集資金興造。在疊砌石拱的技術也是由民間工匠，應用了學習從中國福建傳來的最新石拱結構技術，自主完成建造了取代原來的木造的軟陂橋，成為石拱橋的東寧橋。

最後就臺灣傳統環境裡的節點「曉江亭」，在晚近時，居民砌築了「洗衫窟」，作為日常洗衣的場所，成為豐富生活感的場域。

東寧橋的石砌拱橋具有拱型傳自古老時代之古典美學，與技術傳統的根源，結合茶亭與守護石橋的福德祠之外，又結合居民日常生活的洗衫與對河川水神的信仰，這裡的「曉江亭」，的確是臺灣傳統社會對於市鎮空間的邊緣、通道與節點的認知與其形塑的歷史發展過程，進而分析這個作為環境節點性格之「曉江亭」，與其實質空間構成元素的文化特質的一個重要案例。

參考書目

- (清)王松，《臺陽詩話》「臺陽詩話下卷」，臺灣文獻叢刊第34種，臺北市：臺灣銀行，頁50-51。
- (清)王禮主修，《臺灣縣志》「雜記志九：寺廟」，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103種，臺灣銀行發行，康熙59（1720），頁211-212。
- (清)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29種，臺灣銀行發行，頁49。
- (清)周璽，《彰化縣志》「彰化縣志卷四 學校志：書院（社學附）」，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156種，臺灣銀行發行，道光20（1842），頁147。
- (清)林百川、林學源，《樹杞林志》，臺灣文獻叢刊第63種，頁28。
- (清)林百川、林學源，《樹杞林志》「建置志」，臺灣文獻叢刊第63種。
- (清)陳壽祺纂，魏敬中重纂，《福建通志臺灣府》「兵制」，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84種，臺灣銀行發行，1958.10，頁271。
- (清)陳壽祺纂，魏敬中重纂，《福建通志臺灣府》「城池」，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84種，臺北市：臺灣銀行發行，1958.10。
- (清)劉璈，《巡臺退思錄（第一冊）》「三、稟奉查勘彰化撲子口等處地形由（光緒七年十二月初六日）」，臺灣文獻叢刊第21種，臺北市：臺灣銀行發行，1958。
- (清)鄭鵬雲、曾逢辰纂輯，《新竹縣志初稿》「卷一」「建置志」「橋梁」，臺灣文獻叢刊第61種，臺北市：臺灣銀行發行，1958。
- 〈中國古代拱橋傑作——七橋瓮，唯一用「瓮」而不是「橋」來命名的古橋〉，《每日新聞》，2018.9.17，網址：<https://kknews.cc/culture/bgqej59.html>（2020.3.30瀏覽）。
- 〈片善足錄〉，《臺灣日日新報》，1913.6.17，版6。
- 〈吉本 紅墩臺日歌壇 谷間ゆ上る〉，《臺灣日日新報》，1925.10.19，版3。
- 〈李坪 水引草（三）攝待〉，《臺灣日日新報》，1906.9.15，版3。
- 〈官吏獻上の御茶亭に 聖上親しく御命名 花陰亭、澄空亭、嚶鳴亭の三亭 御命名の御縁り〉，《臺灣日日新報》，1930.7. 2，版7。
- 〈東寧橋竣工〉，《漢文日日新報》，1926.5.3，版4。
- 〈雨中の舟車 頼公圳竣工式の光景 魚取り〉，《臺灣日日新報》，1909.5.11，版5。
- 〈屏東 茶亭新設〉，《臺灣日日新報》，1928.4.19，版4。
- 〈屏東希望社の聯盟旗樹立式〉，《臺灣日日新報》，1930.3.3，版5。
- 〈時事韻語小十八公 惑星會〉，《臺灣日日新報》，1925.8.6，版3。
- 〈烏捷 枯野〉，《臺灣日日新報》，1907.12.29，版1。
- 〈設廠施粥〉，《臺灣日日新報》，1901.5.19，版6。
- 〈新竹短訊 善繼父志〉，《臺灣日日新報》，1921.6.18，版4。
- 〈詩壇 東北京畿紀游吟草（九）游前清三貝勒共建之萬生園內附苗圃茶亭動物園〉，《臺灣日日新報》，1916.1.7，版6。
- 〈榕垣紀事 市政局折燬廣窿穹〉，《臺灣日日新報》，1917.12.19，版6。
- 〈榕垣紀事 國體問題及閩省〉，《臺灣日日新報》，1915.11.21，版6。
- 〈榕垣紀事 飭修馬路〉，《臺灣日日新報》，1919.4.1，版6。
- 〈榕垣紀事 禁紅纓帽〉，《臺灣日日新報》，1915.5.27，版6。
- 〈裳汀 一柿庵偶會 散紅葉〉，《臺灣日日新報》，1908.2.7，版1。
- 〈橫領案取下〉，《臺灣日日新報》，1931.11.28，版4。
- 曾光宗計畫主持，《新竹縣竹東圳文化地景整體規劃暨調查研究成果報告書》，新竹縣文化局，2008。
- 《遇變紀略》「滄洲紀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249種，臺灣銀行發行，頁31。
- 《臺灣私法人事編》「第一章人；第二節品性；第三款宗教；第一 宗教之法規」，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117種，臺灣銀行發行，頁220-221。
- 《臺灣南部碑文集成》「甲、記：甲、記（中）；建造天后宮碑記（嘉慶八年）」，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218種，臺灣銀行發行，1994。
- Kevin Lynch，胡家璇譯，《城市意象》，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14。
- 大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系統製作，《臺灣日日新報 大鐸版》（日據時期（1895-1945）線上資料庫），桃園：得泓資訊公司，2005。

-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網站，網址：<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overview/monument/20010516000001>（2020.4.29瀏覽）。
- 方擁，《建築學報》第11期，1995，頁55-60。
- 王嵩山，《竹東鎮志 政事篇》，新竹縣竹東鎮：竹東鎮公所。
- 田中淡，〈鼓樓風雨橋〉，收錄於《住宅建築》181期，東京都：建築資料研究社，1990.4，頁65-71。
-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客家文化資產數位網歷史建築，網址：<https://hch.hakka.gov.tw/archive.asp?MType=2>（2020.3.29瀏覽）。
- 吳瑞真，《空間的肆應——日治時期屏東宗聖公祠與美濃廣善堂傳統祠廟建築中的時代新思維》，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 沈茂蔭編，《苗栗縣志》「苗栗縣志卷二 封域志：道路」，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159種，臺灣銀行發行，頁19。
- 沈茂蔭編，《苗栗縣志》「苗栗縣志卷二 封域志」「山川」，臺灣文獻叢刊第159種，頁27。
- 周憲文主編、金臺灣資訊事實公司規劃設計，《臺灣文獻叢刊 合訂本（全文）（圖像）光碟檢索資料庫（線上資料庫）》，臺北市：大人物，2000。
- 林子煒，《竹東鎮志 地理篇》，新竹縣竹東鎮：竹東鎮公所，2011。
-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臺北：聯經，1997。
- 金雲銘著，《陳第年譜》，臺灣文獻叢刊第303種，臺北市：臺灣銀行，1972。
- 客家委員會，《竹東圳路古今談——自然水路人文行旅》，客家委員會，2014。
-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學前橋下洗衫窟〉，網址：https://archives.hakka.gov.tw/category_detail.php?id=JC1311000173。
- 茅以升主編，《中國古橋技術史》，北京市：北京出版社，1986。
- 笠原一人、田中禎彥，〈對近代的懷疑：地域、環境、傳統〉，中川理、石田潤一郎編著，《近代建築史》，臺北：南天書局，2019.10。
- 許南英，《窺園留草》「窺園留草：己酉五十八首」，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147種，臺灣銀行發行，1958.10，頁80。

- 連橫，《雅堂文集》「雅堂文集卷四：詩薈餘墨」，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208種，臺灣銀行發行，頁297。
- 連橫編纂，《臺灣詩乘》「臺灣詩乘卷六」，臺灣文獻叢刊第64種，臺北市：臺灣銀行，1921，頁260-261。
- 陳柏志，《「曉江亭」文化資產價值評估調查研究報告》，新竹縣政府文化局補助，2017。
- 陳培桂（1871），《淡水廳志》「淡蘭擬關便道議」「卷二志一」「封域志疆界（道路附）」，臺灣文獻叢刊第172種，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年。
- 陳朝龍纂輯，《新竹縣采訪冊》「新竹縣采訪冊卷五」「目錄：碑碣（下）竹塹堡碑碣（下）」，臺灣文獻叢刊第145種，臺北市：臺灣銀行，1894，頁221。
- 黃承令計劃主持，《新竹縣定古蹟關西東安橋及歷史建築芎林呈甘橋修復再利用計畫》，新竹縣：新竹縣文化局，2016。
- 黃蘭翔，〈順化傳統古建築的特徵〉，《越南傳統聚落、宗教建築與宮殿》，臺北市：中研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08.12，頁383-401。
- 黃蘭翔，〈臺灣漢人建築「燕尾」翹脊之起源與文化初探〉，收錄於《臺灣建築史之研究》，臺北：南天書局，2013.4，頁199-239。
- 臺灣文官武官民間職員錄發行所，《臺灣官民職員錄》，臺灣文官武官民間職員錄發行所，1928.8.18。
- 臺灣日日新報社，〈東寧橋初渡式〉，《漢文日日新報》，1926.5.10，版4。
- 臺灣日日新報社，〈東寧橋落成徵詩〉「翰墨因緣」專欄，《臺灣日日新報》，1926.11.6，版4。
- 臺灣日日新報社，〈樹杞林製糖の認可〉，《臺灣日日新報》，1917.10.11。
- 臺灣日日新報社，〈樹杞林製糖所〉，《臺灣日日新報》，1920.5.25。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耆老口述歷史叢書（十五）—新竹市鄉土史料》，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南部碑文集成》「甲、記（中）」〈修造老古石街路頭碑記（道光二年）〉，臺灣文獻叢刊第218種，臺北市：臺灣銀行，1977。
-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灣課，《臺灣の道路》，臺北市：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灣課，1937.9.20。

- 劉奕成，《日殖時期新竹火車站地區發展歷程之研究（1895-1945）》，臺北：淡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6。
- 劉敦楨，〈中國廊橋〉，收錄於《中國建築史論文選集》第1輯，1982（原載《建築》，重慶中央大學建築系，1943），頁496-501。
- 潘國正，《老照片說故事3——竹塹思想起》，新竹市：竹塹文化資產叢書出版社，2013。
- 鄧毅中，《由產業設施發展歷程論城鄉文化資產的保存——以竹東鎮為例》，桃園縣中壢市：中原大學建築系碩士學位論文，2003。
- 鄭森松，《竹東鎮志 歷史篇》，新竹縣竹東鎮：竹東鎮公所，2005。
- 羅大春撰，《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308種，臺灣銀行發行，頁54。
- 藤森照信著，黃俊銘譯，《日本近代建築》，臺北市：五南書局，2014。
- 櫻井勉任，《新竹縣志初稿》，新竹支廳，明治30（西元1897），臺灣大通書局複印。

A Node at the Edge of a Traditional Town in Taiwan —The Spatial Constitution of “Xiaojiang Pavilion” in Zhug Dung

Irene WU

Doctoral Student,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Erected in Zhug Dung in 1926 when Taiwan was under Japanese rule, the Xiaojiang Pavilion has constituted a comprehensive spatial context with the Dongning Bridge and a village deity temple in the immediate vicinity. Such a spatial context represents not only the history of local development from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o date, but also the distinct roles of this crucial node in different phases, hence exhibiting pluralistic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This article seeks to envisage the cities and settlements that transcend the confines of modernist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and address the question as to how we can grasp the traditional environment constructed beyond the modernist mainstream. Geographically speaking, the Xiaojiang Pavilion is located beside the “path” in Kevin Lynch’s (1918–1984) sense at an end of the Dongning Bridge which divides two districts and crosses the creek deemed the “edge.” In terms of the environmental constitution, the pavilion indeed possesses the conceptual characteristics of a node.

This spatial complex revolves along the Dongning Bridge as its axis. The Xiaojiang Pavilion and the village deity temple were erected together with the completion of the bridge in 1926. Accordingly, the Xiaojiang Pavilion performed a dual function, viz., a memorial “tablet pavilion” and a recreational “tea pavilion.” Furthermore, the role of the village deity temple resembles those of the “lounge bridge,” “wind-rain bridge” or “bridge house” commonly seen in the region covering South China and Vietnam. As a pivotal connecting passage between Zhudong and the mountainous area, the Dongning Bridge was built by local gentry and intelligentsia who shared their predecessors’ charitable spirit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r civil engineering since the Qing Dynasty. They hired local craftsmen who applied the latest technique of stone-arch structure introduced from Fujian to complete the Dongning Bridge and substitute it for the previous wooden one. Recently, a “laundry cave” was built by the residents at the Xiaojiang Pavilion, rendering it a place that enriches their quotidian existence.

The Dongning Bridge exudes alluring charms of classical aesthetics through its stone-arch structure whose technical root can be traced back to ancient times. Apart from reconciling the tea pavilion and the village deity temple that guards the bridge, the Xiaojiang Pavilion also integrated the residents’ laundry routine with their belief in the water deity.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Taiwanese society, along with its cognition of the edges, paths and nodes in an urban space, has found vivid expression in the Xiaojiang Pavilion, which makes it imperative to analyze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vilion as a node in this sui generis spatial context.

Keywords: Xiaojiang Pavilion, Dongning Bridge, Village Deity Temple, Edges, Nodes, Paths